



封面摄影 © Peter Beck/CORBIS; AP/WWP

目录

[内容提要](#)

编者按

[序言](#)

全球化前景

[关于全球化的一次对谈](#)

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格拉斯曼、《外交政策》杂志主编奈伊姆、美国企业研究所学术专家巴菲尔德讨论全球化的现象及利弊。

实例二则

· [北极猴](#) 英国 iPod 时代的第一批超级明星

· [圆领衫旅行记](#) 乔治敦大学金融学副教授里沃利

[促进转变的美国经济政策：贸易、增长与发展三者挂钩](#)

美国国务院经济、商务与农业事务副国务卿夏纳谈贸易与经济的关系

[职业环境变化——采访丹尼尔·平克](#)

商务顾问、演讲人、作家平克分析全球化趋势及其对全球人的影响

文化对话

[美国文化是"美国的"吗？](#)

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历史学教授及美国文化专家培尔斯分析"美国"文化本质及其流行全球的原因

[一位欧洲人看美国文化的影响](#)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历史学教授、德-美关系专家吉诺-赫克特从大西洋彼岸观察美国文化的影响

[国际名人风貌 —— 影集](#) □

全球化时代的名人风貌

新威胁与新机会

[全球化与人权和民主](#)

加图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及贸易、移民和全球化问题专家格里斯沃尔德分析贸易、发展与政治改革的关系

犯罪与恐怖主义的全球化

美利坚大学外交学院教授、著名学者兼作家谢利谈在全球化过程中犯罪、恐怖与腐败势力结成的"非神圣三一体"

全球健康相关性

美国匹茨堡大学医学与公共卫生学教授、前世界卫生组织消灭天花病项目首席医务专员亨德森谈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健康的相关性

小资料:

- [让国际健康规则适于变小的世界](#)

- [国际海啸预警合作](#)

高等教育中的全球问题

范德比尔特大学国际教育政策学教授海尼曼谈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

内容提要



一位中国老先生在上海星巴咖啡店前稍事休息。

EUGENE HOSHIKO ©AP/WWP

世界银行将全球化定义为“国际经济和社会的日益一体化”。网上百科全书《维基百科》形容全球化是“由国际贸易与文化交流剧增导致的各个社会以及世界经济的变化”。最近，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用约翰·伦农(John Lennon)一首歌里的歌词来比附全球化：“想像那国家全不再有，做到这点并不难”。显然，全球化的含义因人而异。

在本期杂志中，我们将透视全球化的各个方面，请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检视这个现象。但是，这里所提供的并不是解决方案或绝对答案；我们的目的是使读者通过这些文章加深对这一影响我们所有人的深刻复杂现象的理解。

在第一单元，我们首先就全球化的发展方向进行观点交流——由新闻工作者詹姆斯·格拉斯曼(James Glassman)主持，委内瑞拉经济学家莫伊赛斯·奈伊姆(Moises Naim)与美国贸易专家克劳德·巴菲尔德(Claude Barfield)加入讨论。这两位学养丰厚的观察家从全球化是否利大于弊，到全球化对宗教态度的影响等多方面作了深入探讨。接下来，美国负责经济、商务及农业事务的副国务卿乔塞特·夏纳(Josette Shiner)阐述了自由贸易政策与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关系。这个单元的最后是对丹尼尔·平克(Daniel Pink)的采访。平克是最近两部颇有影响的著作《自由职业国》(Free Agent Nation)和《全新思维》(A Whole New Mind)的作者。他从理论上说明，全球化正在改变我们的工作方法甚至思维方式。

在接下来的单元，我们探讨一个争议极大的问题——美国流行文化对世界各国民族文化的影响。德州大学的理查德·佩尔斯(Richard Pells)教授认为，美国文化深受外国的影响，是各种文化的集合体，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世界文化。德国的杰西卡·吉诺-赫克特(Jessica Gienow-Hecht)教授则对长期以来其他国家知识分子以及政府官员如何看待美国文化进行了分析。最后是一组当前国际著名歌星、影星和球星的照片。

期刊的最后一个单元进一步探讨了全球化所带来的新威胁以及新机会。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丹尼尔·格里斯沃尔德(Daniel Griswold)认为，在受全球化影响最大的国家里，经济进步与自由、人权、民主的发展相互关联。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国际关系学教授路易丝·谢利(Louise Shelley)分析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更开放的边境与高新技术使犯罪分子以及恐怖分子网络更易生存和活动。公共卫生专家唐纳德·亨德森(Donald Henderson)审视了在人与病毒可通过飞机在几个小时之内到达世界各地的今天，世界所面临的传染病威胁。这个单元中的相关资料则显示了“地球村”的正面作用之一——通讯手段使各国在自然灾害后能展开更为有效的合作；2004年印度洋海啸便是一个实例。最后，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的斯蒂芬·海尼曼(Stephen Heyneman)教授对世界各地的大专院校的共同抱负作了考量。

如果说，在所有这些讨论中有一点不容置疑，那么它就是：全球化已在眼前，且不会消失。奈伊姆在谈到互联网时说：“现在有各种各样志趣相投的群体，利益集团，以及那些有着共同兴趣、激情、技术和爱好的人们，他们不受国界限制地聚到一起，形成了网上群体，……产生出各种各样的新政治动力。”他还说：“这是不可逆转的。……先前的全球化浪潮是机构化的、商业化的，其核心角色是贸易公司；今天的全球化是个体化的。这一点有很重要的区别。”

——本期编辑

序言



"要知道，我并不反对全球化，只要它不是在我的后院。"

©THE NEW YORKER COLLECTION 2001 ROBERT MANKOFF FROM
CARTOONBANK.COM 版权所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0年的一期专题简报采用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标题：《全球化：威胁还是机会？》。作者把全球化描述为“人类发明与技术进步带来的历史进程。全球化指的是国际经济和社会的日益一体化——特别是通过贸易与金融流动”。

的确，一谈到全球化，很多人想到的是自由贸易；近年来，关于全球化的主要讨论也围绕着经济效果。但是，全球化还包含着重要的心理层面。

在1960年代，媒体分析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创造了著名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一词，以此形容在无线电波将地球各地连在一起后，世界产生的深刻文化变迁。远在网际世界还未出现以前，麦克卢汉就对通讯技术的发展给传统与现代社会带来的冲击作出了分析。

有很多学者对此作了更进一步分析。现任设在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教务长的来自印度的人类学家阿俊·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认为，全球化是“(在强大的高新信息通讯技术驱动下的)刚刚开始的一次新工业革命的别名。它是如此之新，以致让我们难以用现有的语言和政治资源去理解和予以把握”。阿帕杜莱列举了全球化的五种相关特征：跨越国界的人口、资金、观念、媒体图像以及技术流动。

人们对全球化争议最多——且常常很动感情——的问题是：全球化的效果究竟是利多于弊、还是弊多于利？诚如世界银行的网页所言，全球化“是近年来在世界经济学中最有争议的课题之一。中国与印度等20年前的贫困国家的快速经济成长和减贫，显示了全球化的正面效果。但另一方面，人们对全球化导致的更多不平等和环境恶化的担忧，在国际上形成了强大了反对全球化的势力”。

经济全球化往往像一种竞赛，既有赢家也有输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题简报说："全球化的确为世界范围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机会，但它的进程并不平衡。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迅速地与全球经济融合。那些能够融合的国家，其经济快速增长，贫困减少。"

阿帕杜莱指出："在美国等最富有的大约 10 个国家中，全球化无疑是企业精英及其政治盟友口中的时髦词汇，但对于季节工、有色人种、其他边缘人(所谓'北半球'中的'南半球'人)而言，全球化带来的是对落伍、失业和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忧虑。"

但是，当全球化开始导致工厂及服务业向低工资国家迁移，即形成外包现象时，它也给美国等发达国家造成严重不安。

然而，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勒格林(Phillipe Legrain)最近谈到了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好处。他写道："全球化的美妙在于，它把人们从地理的专制中解放出来。一个人出生在法国并不意味着他只能讲法语、吃法国菜、读法文书、参观法国博物馆。一个法国人——或美国人——可以在西班牙或佛罗里达度假，可以吃日本寿司或意大利面晚餐，可以喝可乐或智利葡萄酒，可以看好莱坞大片或阿莫多瓦(Almodovar)的片子，可以听邦拉舞曲(bhangra)或饶舌音乐，可以练瑜伽或跆拳道，可以读《Elle》或《经济学人》，可以拥有来自全世界的朋友。"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也是一位对全球化效果持乐观态度的人。他在最近出版的《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这本畅销书中指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技术意味着：为了追寻专业技能与低劳动力成本，职务可被移至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有更加新颖的合作方式；印度班加罗尔的医生在美国午夜时审看美国病人的 X 光照片——这在弗里德曼看来——对两国都有利。用他所喜欢的一个比喻来讲，经济竞技场已被夷平。

然而，即使弗里德曼也认为，全球化具有不稳定因素。他写道："平面世界意味着我们把星球上的所有知识中心统统连成一个单一的全球网，如果没有政治与恐怖主义者设置障碍，这个网将会带来一个繁荣与发明的崭新时代。但是，想到这种平面世界也让我充满畏惧，我个人的畏惧来自于一个明显的事实：在一个平面世界中，不仅仅是软件作者和电脑奇才能够通过合作如虎添翼；"基地"组织与恐怖分子网也能如此。夷平的竞技场不但吸引了新的发明家，使他们能够大显神通，同时也形成了新的一批愤怒、受挫折、受羞辱的群体"。

设在瑞士、旨在定期组织商界与政府领导人共同商议世界发展前景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创建人克劳特·斯马亚(Claude Smadja)与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在 1999 年的一篇文章中，对全球化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作了如下概括："在这样一个强调赋予人民能力、强调全球民主大发展、强调人民掌握生活自主权的时代，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确立起市场的优越地位。我们必须显示，全球化不是不顾一切、只注重股东价值的代名词；我们也必须显示，促进货物与资本的自由流动不会有损于弱势人口，不会损害某些为人们所接受的社会标准与人道

标准.....。如果我们不能找到让全球化更加包容的途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前景：以往那些尖锐的社会冲突会再度出现，并且扩大到国际范围。"

高级主编

George Clack

关于全球化的一次对话

我们召集三位专家讨论全球化及其引起不满的原因

对话主持人詹姆斯·格拉斯曼 (James Glassman) 是美国企业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研究员，曾担任过编辑、发行人、《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现在是专门探讨高新技术与公共政策关系的 TCSDaily.com 网站的主持人。莫伊赛斯·奈伊姆 (Moises Naim) 现任《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杂志主编。他是一位委内瑞拉的经济学家，曾在世界银行任职，并在 1990 年代担任过委内瑞拉轻工贸易部部长。他最近出版了一本专著，题为《非法活动：走私犯、偷运客、抄袭者在如何劫持全球经济》 (Illicit: How Smugglers, Traffickers, and Copycats Are Hijacking the Global Economy)。克劳德·巴菲尔德 (Claude Barfield) 是一位贸易问题专家，曾担任美国贸易代表顾问，现在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他著有《自由贸易、主权、民主：世界贸易组织的未来》一书 (Free Trade, Sovereignty, Democracy: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目前他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



许多人认为，全球化是最近的现象，但专家解释说，全球化是从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进行贸易时就开始发生了，形式多种多样，迄今已有悠久的历史。事实上，从 1870 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时期，运输与通讯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曾把这段时期看作是全球化的黄金时代。以下进行的范围广泛的讨论也将涉及中国与东欧最近的变化，民族国家的未来，假冒品与其他形式的非法贸易，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全球化与宗教热回升的关系，以及全球化对民主与独裁的影响等。

实例

[北极猴](#)：
英国 iPod 时代的
第一批超级明星

[圆领衫旅行记](#)
乔治敦大学金融
学副教授里沃利

格拉斯曼：让我们先从基本的问题开始：什么是全球化？

巴菲特德：我想每个人有不同的定义，我比较满意的说法是，全球化就是技术变化对每个国家与社会所造成的历久冲击。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技术为基础的。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最近几十年以来运输效率(随产随运)的突破，加上可以把信息在瞬间传给世界上任何个人、任何机构的通讯革命，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这种更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全球化。

格拉斯曼：这是新现象吗？

巴菲特德：不是。我看它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当不同的国家或社会之间有商贸活动的时候，全球化就开始了，因为在不同的人民之间出现了观念交流、流动和交易——商业交易。这是全球化的初始。社区不再是相互隔绝的了。

格拉斯曼：那么你是以贸易来定义全球化了？

巴菲特德：其实，我想既从贸易、也从社会状况[来定义它]。我们看到的最近两个时期是 19 世纪末与 20 世纪初。大约从 1870 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运输与通讯技术发生了变革，然后就有了所谓的发达国家之间的紧密结合，其紧密程度事实上超过了今天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回顾这段时期，有人把它看作是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再有就是 1945 年发端的这股力量，在 70 年代与 80 年代不断增强，然后到了 90 年代，即时通讯以及快捷旅行的新技术突飞猛进。

当然，公共政策可以影响全球化。如果检视美国在 1920—21 年的政策、30 年代初大萧条开始后的欧美国家政策，以及当时相当发达的阿根廷等国的政策，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些国家当时都采取了自给自足政策 [旨在达到经济独立]。他们闭关自守，削减贸易，削减投资。

格拉斯曼：这种真的“自给自足”的国家现在还存在吗？

巴菲特德：可以把北韩看作一个明显的例子，但是它的情况也在变。前苏联靠内部政策在东欧建立的是自给自足的体制，那里没有什么贸易。

格拉斯曼：有些人说全球化是美国人的观念，而全世界在采纳美国的概念。这个说法准确吗？

巴菲特德：我认为只能这样讲：随着 20 世纪的发展，美国一直处在科技领先地位。即使在大萧条时期，也是如此。

格拉斯曼：全球化的好处有哪些呢？

巴菲特德：我认为它的最大好处是，消费者可以得到更价廉物美的产品，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这一切是从经济生活开始的，但不仅限于经济，因为人们的生活目标不仅限于经济目标。全球化是一种途经，通过它人们可以达到其他的个人、国家、社会目标。

格拉斯曼：莫伊赛斯，在你的新书《非法活动：走私犯、偷运客、抄袭者在如何劫持全球经济》中，你谈到了全球化不仅涉及技术变化，而且涉及政治变化，你写道：“近来的全球化浪潮常让人想到政治革命，其深度与转变力不亚于技术革命”。请告诉我们，这种政治革命是由科技革命引起的，还是因为有了信息革命？它是怎样发生的？

奈伊姆：我认为我们并不清楚。我们仅知道它们是同时发生的，可以非常有把握地说，人们获得的信息越多，他们就越可以了解其他人的生活方式，从而使他们产生争取自由的强烈愿望。所以，在通讯交通新技术与1990年代发生的导致边界开放、民主化浪潮兴起的政治革命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很难判断其中的因果联系，但这不重要。我们知道这两个方面是趋同的，我认为这点非常重要。

在这本书里，我的一个目的是，把常被联在一起的全球化与贸易的关系分开，把全球化与投资分开，把全球化与经济分开。我们必须了解，将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方式远远超过经济与贸易，这一点很重要。要知道，9·11事件是全球化的一个例子。对世贸中心的攻击，起源于世界另一边的政治动荡。恐怖主义者依赖全球化的工具与技术。他们也利用了政治变迁所导致的边界开放机会。

巴菲特德：我同意。不过，对政治革命的层次范围我不是很确定。我确实认为需要谨慎。这是我们在未来数年中必须搞清楚的一个迷，不单是我们，而是所有国家都必须搞清楚。在全球化过程中，技术越境而来，政府不再能够像以往那样控制自己的人口，但是民族国家仍然是民主合法性的重点。现在没有超越民族国家的民主，也许将来会有。我们必须从有可能的地方着手努力，或者说一个国家可以合理地做什么，应该放弃什么。我们对此争论不休，诸如美国政府对国际刑事法庭的立场，我们要给联合国多少权力，给世界贸易组织多少权力等。

格拉斯曼：许多人说，伴随全球化的技术发展，民族国家会走向衰亡。然而说它衰亡，似乎还言之过早，但你认为这会发生吗？

奈伊姆：我认为不会发生。我的确也认为，民族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核心以及组织成份。有关国家衰亡的讨论有很多，但我坦率地说，那是很愚蠢的。民族国家将长期存在，目前所发生的只是，全球化导致民族国家的转化，民族国家被新技术必然带来的自由政治所转化。与过去相比，民族国家所面临的限制越来越多、越来越紧。你与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谈话，包括专制政府的领导人，他们都会告诉你，他们的力量很有限，远比过去有限得多。

格拉斯曼： 究竟是什么样的限制呢？是因为国民与外界有了更多接触，还是因为外资流入？

奈伊姆： 我想都是。专制领导人要对付债券市场、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这些因素对他们的经济决策有制约。他们也面临各种各样的贸易限制及可能性。他们也面临某些国际标准。他们不能像过去那样随便和公开地使用酷刑。当然，酷刑还存在，也会继续存在。但一个有趣的变化是，因为全球化以及 90 年代的变化，独裁者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高枕无忧了。独裁者的行程如今不见得总是从总统府到(渡假圣地)里维耶尔别墅；他们也许会像米洛舍维奇一样，走上法庭。

格拉斯曼： 我现在想让大家谈谈全球化的不利影响。因为，克劳德刚才谈过全球化的积极影响，如经济增长，接触更多新思想，也许正像你所说的，更多民主，更少独裁控制。你在书中谈到全球化的一个缺陷。你相信，有越来越多的设想、越来越多的东西在遭到偷取、剽窃。你一上来就举了个很好的例子，提到克林顿的自传如何在中国被盗版，而且有些地方被改写。我们是不是真的应该对此感到担忧？对于许多日益投入知识产权产品生产的国家，这是否意味着资源流失呢？

奈伊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一般而言，当人们想到假冒品的国家，以及假冒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爆炸性增长时，脑子里浮现的是可用廉价买到的伪造名牌运动鞋、高档女士手提包、或者是可以不付钱盗版的电影与音乐光盘。那么问题是，究竟谁是受害者？

但有些因素往往被人们忽视。首先，各种非法贸易是相互联系的，情况常常是，卖给你高贵提包的人，那个街上摊贩，其本人同那个提包一样，也是非法的。他很可能是从另一个国家偷渡来的。他后面有一个从事偷渡人口、贩卖假冒品的网络，他被他们利用，受他们剥削。这个摊贩如同奴隶一样，在努力偿还他欠人口贩子的债务。

这些人往往不是快乐的志愿者。以国际贩卖妇女为例，那些妇女是被机会所诱惑，认为她们将从东欧到西欧去做家庭女佣。而后，她们被胁迫卖淫，受到剥削。在这类贸易中占很大成份。

回到假冒品的话题。我们可以开玩笑地谈到，一个价值 5000 美元的名贵手表在曼哈顿街头花 20 美元就买到了，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有些冒牌假货是很危险的。有些假冒的飞机零件，质量有问题，会导致飞机失事。有些假冒医疗器械不是救人，而是导致人死亡。假冒品贸易与各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不像手表和提包那样可以轻易地被容忍。

格拉斯曼： 克劳德，我们来谈谈全球化最常见的一些现象。我刚参加了在香港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韩国的农民在举行抗议，引起不少注意。他们抱怨说，韩国如果开放大米贸易，他们就会失业。他们说，除了种稻子，他们不会做别的，其

他事情都不擅长。他们是一些上年纪的人，而大米并不昂贵啊。这些稻农的困境是不是全球化的负面作用之一？还是说这最终具有积极意义？

巴菲尔德： 我认为，在处理开放贸易或投资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点上，政府都是失职的，因为政策欠佳。那些韩国农民，世世代代都做同样的事，没有人来帮助他们适应变化，或调整转型，只有当发生磨擦时——就象韩国正在发生的这样——才会有人来介入。我认为所有政府都是失职的，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握住应该怎样作出调整，但对于所涉及的国家而言，不管是在韩国、美国、英国还是在欧洲，作为一种道义或曰社会义务，政府应该介入。而这可能是一个痛苦的局面。

但事情也有另外一面。反全球化运动带有不少浪漫情怀，认为不应干扰亚马逊河上游的部落，或墨西哥南部的贫困农民，好像墨西哥的开放对他们非常有害。但是，想一想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我们怀念过去的日子，说什么 19 世纪的美好农家生活。但即使在当时美国中西部和南部的农场，劳作时间也是漫长的，人们没文化，生活艰苦单调。所以，转型问题是公共政策的问题，非常重要。就象另外一位发言人所说，这一切谁也无法阻止，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这种调整更为社会或道义所接受？

格拉斯曼： 有些人提出，使全球化更能为人们所接受的一个办法是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以不同的速度消除贸易壁垒。你同意吗？

巴菲尔德： 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说，我们在纺织品与服装领域需要 10 至 15 年时间，这是很多经济体给予最多保护的行业。因此，在 90 年代初期，我们说给自己 10 年时间。同样，发展中国家也说，再多给我们 10 年至 15 年时间。但问题是，没有任何人采取行动。

所以，我对多给点时间没有异议，但是这个时间要确定，要尽量具体化。大家不要忘记，发展中国家常提到的所谓特殊待遇与区别待遇，其实是使他们自己更长时间地受地方垄断和低效工业之害。因此，这不是帮助他们。

格拉斯曼： 除了非法假冒品贸易以外，全球化还有其他的负面影响吗？

奈伊姆： 有负面后果，其中有些我们已经在看到。老百姓普遍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民众予以抵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大事将临的感觉，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会产生非常、非常深远的影响，关系到公司的生死存亡，甚至整个行业都会被重新定义等。我们在美国过去一年来也听到对外包问题的激烈辩论，也就是雇用亚洲，雇用印度雇员，做以前在美国做的事。你可以感觉到很多焦虑，而且远远不仅是因为失去工作这一点。如果把失业数字与对外承包相比较，失业数字是很小的。然而，大辩论让你觉得有数十万美国人丧失工作，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对于全球化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焦虑，因为人们觉得正在发生的变化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公司、社区最终是不是会受到冲击。

格拉斯曼： 我一直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受益非常普遍，而代价非常局限的情况，代价只体现在一些受损失的具体行业——美国的制鞋业或韩国的水稻业——这些人在拼命叫喊，而你是在讲的忧虑却更为普遍。这有事实根据吗？

奈伊姆： 最好的例子就是你提到的韩国稻农。在那些会议上，水稻的消费者在哪里？毫无疑问，韩国会有一代种植水稻的农民因为国际大米贸易的规则而受苦，但更多的人会因贸易开放和消除造成贸易扭曲的稻米补贴而获益。但会议上没有消费者的代表，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只得到很小一点好处，有时甚至很难让人看得到，而韩国的农民所受的打击就在眼前，具体可见。这使他们更容易动员组织起来。

你的意思是，的确有这些问题，但还有更广泛的意义。我认为，我们仍然在调整思维方式、适应这个新世界的过程中。那些传统的旧意识形态——如社会主义或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给很多人确定了看待世界和理解变化的模式，那时候世界上有两个相互制衡的超级大国。但现在只有一个超级大国，我们每天都从新闻中听到新的令人无法解释的变化，从克隆到互联网带来的变化、到非法贸易、伊拉克战争以及愿意杀身成仁的自杀式国际恐怖主义者等。

巴菲尔德： 不仅封闭社会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我们的社会从传统来说一直具有流动性，接受新观念，这些能力比其他社会更强，也不那么瞻前顾后。但是，从经济学以外的角度看，人们现在越来越感觉到，有很多东西是自身无法控制的。我这里指的是个人，不是政府。这些无法控制的东西来自从生物技术到信息革命的巨大冲击等各方面。

年轻人大多能接受这些，也能理解。他们懂得怎样摆弄手机、电脑等等，但是他们也清楚，即使对于他们而言，技术也会变得令人伤脑筋。

格拉斯曼： 但是，事情是不是真的比过去更让人难以控制呢？还是说，我们现在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比过去知道的更多了？换句话说，我又要提到信息通讯的作用。总的来说，它也许是有益处的，但也带来更多的担忧。比如，我们目击的自然灾害越来越多了，但很多科学家认为，事实上不是自然灾害更多了，而是我们一下子就知道了正在发生的事情。

巴菲尔德： 我认为兼而有之。人们说——我们听说，在 19 世纪初期到中叶人们刚刚看到火车的时候，吓得要死。在收音机刚刚出现、人们可以听到来自自己县或城市以外的声音的时候也是这样。我想时下的情况是因为变化来自四面八方，它来自各个领域，不仅来自科学，也来自技术。

格拉斯曼： 莫伊赛斯，你认为全球化与宗教狂热有关系吗？有人把宗教狂热叫做原教旨主义，它不仅出现在穆斯林世界，也出现在其他宗教中。

奈伊姆： 在美国就可以看到，这点毫无疑问。其结果是朝更加宗教化发展，使宗教活动方式更加正规化，在日常生活，甚至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更多的原教旨主义的宗教解释。我认为在你的问题背后存在着一个很重要的假设，也就是说，随着世界的变迁，不论是因为全球化还是信息革命，随着两位所谈的这些变化对每一个人产生影响，人们都在寻找精神支柱。生活的可预见性减少了。人们过去认为，自己的生活将多少会像他们的邻居或父母一样，但现在则感到，在自己的一生中会发生很多事情——会有很多美妙的事情，但也可能碰到一些可怕的事情，使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不会像邻居、父母或兄弟姐妹的生活一样。

因此，带着这种前途未卜的不确定感与焦虑，人们需要抓住什么东西，我觉得宗教提供这样的机会。这是某些国家的情况。在另一些国家，宗教代替了对繁荣的希望。中东的许多国家经济表现非常差，即使在许多富庶的国家，也非常差。如果把把这个情况与年轻人口比例大的因素结合起来看，很多年轻人基本上没有希望——没有希望看到政治改善，没有希望参与公共事务或国家政治生活，没有希望使生活真正富起来或者得到更丰富的物质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就成为一个很吸引人的出路。人有追求理想、观念、希望、激情、宗教激情的需要，而宗教往往成为能满足这种需要的唯一可能。

巴菲尔德： 很有意思的是，在这点上中东要算是处于前沿或中心。只要想一想正在发生的情况。我们刚才谈到人们的生活来源被断绝，生活被改变。想像对一个年轻人是什么情况，比如，他们生活在 60 年代、70 年代或 80 年代的中国，他们会怎样说。再看看现在这一代年轻人，比如现在中国十几岁的青少年。我们的研究所就有一些年轻人——中国的年轻人。他们非常相信将会有某种形式的民主。他们都是学企业管理的，是非常实际的那种人，不是理想主义者，但即使如此，转变过程也将是很困难的。

格拉斯曼： 请允许我问一个几乎老掉牙的问题，但我还是非常想知道它的答案：全球化——让我们仅从经济上定义它，也就是，经济更加开放、更加由市场主导——会自然而然导致民主化吗？

奈伊姆： 我觉得现在还为之太早。我们不知道。

格拉斯曼： 不是仅指中国，而是任何其他地方呢？

奈伊姆： 任何其他地方我们都不知道。不要忘记，全球化浪潮贯穿整个历史，这不是世界第一次发生经济体之间的密切融合。这一次全球化在 90 年代开始，来势很猛。信息革命与前苏联的垮台同时发生，许多从前封闭的国家开放了。此时此刻它就在发生，其迅猛和形式我们迄今仍不能完全把握。在某些地区，全球化为民主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但在其他地区，则阻碍了民主。

格拉斯曼： 在哪些地方阻碍民主？

奈伊姆： 我想到的例子有那些石油国家。在那里，全球化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现在油价很高，原因是中国以及全球经济的迅猛发展。这给那些专制国家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收入，然而，这些高额收入成妨碍经济与民主改革。

巴菲尔德： 我没有非议，但我想不幸的是，他们只有这一个来源，全球化对他们的冲击不那么大。

格拉斯曼： 我认为更主要的问题在于石油资源为政府所拥有、所控制。

巴菲尔德： 话是这么说，但总体而言，这些国家不像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家那样疲于应对。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全球化是否"自然而然"地产生民主。答案是否定的。但这个论战还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继续，一方是现实主义者，另一方是所谓自由国际主义者——奈伊姆的书就深入到这个论战中。我们研究所的情况是，那些研究安全与外交问题的人说，你们经济学家以及全球化的支持者总是说会导致民主，但是看看中国人，全球化并没有导致民主。对此我是同意的。我认为不存在这样一个自然而然的进程。

但我们不能否认，伴随全球化，即使中国政府能够部份地控制互联网与其他信息来源，但如今它已不可能控制人民得到的信息，不可能做到将人民完全封闭，不可能像 50、60 年代在东欧，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或在中国 60 年代那样实行控制。那么再想到，中国还让学生到世界各地留学。如果你是处在权力最高层的话，那么你已经释出了一种最终无法控制的力量。它会不会产生民主，我不知道，但不容否认的是，它必定会给任何当权者带来不安。

格拉斯曼： 你同意这种意见吗？

奈伊姆： 我完全同意。我们不要忘记，人类的大多数目前仍然生活在非民主的体制中。这是常态。今天常态中的人，是没有一日三餐的人，是不能从独立的渠道获取信息的人。今天人类的三分之一没有电话，从来没有用过电话，大多数人并不是生活在民主社会。世界上大多数的儿童不能上学。世界上大多数的人没有正式的薪资工作。

巴菲尔德： 我认为需要谨慎。必须承认，今天生活在某种民主政府下的人，超过人类历史的任何时期。

格拉斯曼： 过去 30 年里，民主国家的数目增加了两倍——尽管大多数人不是生活在民主制度下，假如我们像多数人那样，把中国列为不民主。

我们谈谈全球化的走向。人类历史上有过全球化，但它嘎然而止，并经历长时间的停滞，至少 40 年到 50 年。这种现象有没有可能重现？全球化究竟会持续下去，还是将循环往复？

我尤其关心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很多人还没有加入到全球化的过程中来。有什么办法来应对这种情况吗？

巴菲特德： 观察一下发展中国家——不要理睬其政客怎么说，或他们及政府首脑在香港的贸易谈判中会签署什么。以东亚甚至拉美国家为例，回到刚才的问题。这些国家虽然拒绝签署保障投资者与投资的协议，但却都门户大开。

另外一个值得记住的是，就贸易而言，也许除了非洲与中东以外，在几乎所有地区，发展中国家自动开放市场的程度——不要谈那些谈判——是非常之大的。阿根廷也好，印尼也好，在过去 20 年开放的投资市场，远远超过了他们愿意签署的协议，但现在这些都在发生。也就是说，他们信服了。他们看到这是发展方向，但让他们感到非常紧张的是，担心会被揪到世界贸易组织或其他国际组织前被勒令这样做。他们想要对外国人开放，对通用汽车或通用电器公司开放，但他们不愿意有人来教训他们说，在你们在巴西，智利，或者墨西哥的公司中必须都采用同样的规则。

格拉斯曼： 但总的来说，你对发展中国家及全世界抱持乐观态度，是这样的吗？

巴菲特德： 是这样的。

奈伊姆： 如果我们对全球化的定义大量包含贸易与投资的内容，那么是这样。贸易周期有高有低，我们也许会面临保护主义的间歇发作。

格拉斯曼： 顺便问一下，那你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正在出现吗？

奈伊姆： 我不这样认为。贸易现在非常强劲、自由。国际贸易年年增长，比全球生产总值增长还快。不错，的确有各种各样的贸易障碍，各种补贴与扭曲，但贸易还在向前发展。

我们不妨把全球化的定义再扩展一下，不仅仅包括贸易与投资，而是把它与 19 世纪相比。当电报诞生时，全世界通讯大发展。但是，电报大多是为机构所用，今天不同的是，互联网被十几岁的年轻人所用，使世界各地其他志趣相投的年轻人被联系在一起。现在有各种各样志趣相投的群体，利益集团，以及那些有着共同兴趣、激情、技术和爱好的人们，他们不受国界限制地聚到一起，形成了网上群体，他们能够展开各种各样的活动，具有各种各样的能力，产生出各种各样的新政治动力。这是不可逆转的，因为正如巴菲特德先生所说的，你可以控制互联网，但是你的控制程度是有限的。

所以，现在无秘密可言。人们在组织起来。这种更加个人化的全球化是史无前例的。先前的全球化浪潮是机构化的、商业化的，其核心角色是贸易公司；今天的全球化是个体化的。这一点有很重要的区别。

促进转变的美国经济政策：贸易、增长与发展三者挂钩

美国国务院经济、商务与农业事务副国务卿
乔塞特夏纳
(*Josette Sheeran Shiner*)

美国国务院经济、商务与农业事务副国务卿夏纳谈
贸易与经济成长的关系

为什么有些国家经济增长强健有力，而有些国家则不是？从 1975 年至 2003 年，世界一半以上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低于百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国家变得更加贫困。如果我们把那些体制太弱因而无法收集可靠数据的 35 个国家也计算在内，这个数字可能更大。



经济学家与发展问题专家在找寻原因的过程中，越来越发现贸易的相关性。如果放眼上个世纪的世界，人们很难看到保护主义带来的好处，但糟糕的保护主义政策却比比皆是。1929 年股票市场崩盘以后，美国的孤立主义使大萧条骤然而至；60 年代与 70 年代发展中国家奉行的进口替代方略阻碍了经济成长；共产主义压抑了生产率、创新以及经济自由。保护主义没有任何长久的益处。

而另一方面，贸易自由正在对全世界的经济成长、减贫和稳定作出重大贡献。经济研究证明，那些致力于开放经济、促进国际贸易的国家，比封闭的国家享有更高的增长率。1990 年代，在发展中国家中，世界贸易最活跃的国家与不甚活跃的国家相比，增长率是后者的三倍。

中国和印度是自由贸易大显身手的两个显著例子。30 年前，这两个国家普遍处于贫困状态。时至今日，它们的自然资源基础没有什么变化，它们的政治制度也基本照旧，但它们现在却具有世界上最高的经济增长率。是什么发生了变化？它们向世界开放了市场，从而导致全球历史上最迅速的减贫。非政府组织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的报告说，如果非洲、东亚、南亚、拉丁美洲分别将国际出口增加百分之一，那么，由此增加的国民收入将使 1.28 亿人脱离贫困。

美国通过推动将贸易、援助、发展相结合的新经济政策，率先促进这种经济机会。

赖斯国务卿十分强调贸易与经济增长在社会转型中的巨大作用，她说：“美国传播稳定的民主与自由的最重要工具，莫过于我们的经济外交以及自由贸易和发展援助的好处……”。

降低贸易壁垒

通过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全球贸易谈判，我们努力推进一些大胆的计划，旨在消除关税、定额、扭曲贸易的补贴等。我们要求其他国家也这样做。美国的经济活力与美国和主要贸易夥伴降低贸易关税息息相关。在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成员国之间，货物平均关税已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百分之四十，降到今天的百分之四。低关税鼓励竞争，激励创新，导致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观念与技术的交流以及外国投资。低关税还降低行业生产成本，有助于它们在全球竞争。发展中国家有着从贸易更加自由化中获益的独特机会，因为这些国家的平均关税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所付关税的百分之七十，其实是用在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的项目中。



一位印度股票交易商正在孟买股票交易所工作，这里的股票指数 2005 年 2 月 14 日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RAJESH NIRGUDE
AP/WWP)

人们普遍认识到，改革农业贸易是扩大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通过正在进行的世贸组织谈判逐渐开放农业市场，将可能使数百万人摆脱贫困。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全球农业贸易改革的 93% 的成果将来自进一步开放市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几乎所有的好处都将来自于降低其进口关税。

当然，仅靠贸易本身，并不能自动导致经济增长、就业增加、减少贫困。发展中国家如果希望从自由贸易与经济增长中获益，就必须有健全的国家政策，如良好的政府管理，法制，有力的机制，合理的货币与宏观经济政策，以及致力于人力资源投资。这些健全的政策即使在很好的环境中尚且难以得到保证，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压抑商业活动的政策更是使它们无力实行这样的政策。平均而言，在撒哈拉南部非洲国家，注册一个公司需要 63 天，注册费为该国人均收入的 200%。在澳大利亚，注册一个公司只要用两天时间，注册费为人均收入的 1.9%。当发展中国家为发展可持续经济而采取行动时，投资者会更有信心在其市场进行贸易与投资活动。一个友善的商务环境将有利于吸引外国的直接投资，从而带来就业增加、收入增加，经济增长。

世纪挑战帐户

布什总统基于对这一点的了解，提出了一个新的、富有创意的发展援助项目，叫做“世纪挑战帐户”(Millennium Challenge Account)，这个项目由世纪挑战帐户集团(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负责执行。这个项目汲取了过去 50 年以来的发展援助经验——将健全的经济政策与新的贸易、投资机会相结合。世纪挑战帐户主要是一个对外援助项目，但它同时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自由贸易的环境。

美国创立了一些新项目，将贸易能力建设的措施与贸易措施相结合，使贸易能力建设成为美国在全球、地区以及双边贸易议程中的有机组成部份，这也为发展中国家

提供了它们利用贸易开放带来的好处所需要的工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成立了一个主管贸易能力建设的专门办公室。这些行动使美国成为支持贸易能力建设的最大捐助国家。美国 2005 年度提供的资金超过 130 亿美元，并且承诺在 2010 年度以前将资金增加一倍，达到每年 270 亿美元。

美国将贸易、援助与发展挂钩的创新举措，已经初见成效。美国与中美洲的自由贸易协定实现了一项创举，即将贸易能力建设作为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组成部份。美国通过协助萨尔瓦多的农民改进市场行销技术，严格食品标准，提高生产力，促进农作物的商业服务而帮助他们开发了新市场。他们的平均收入翻了一番。在此之后，这个模式被推广到美国与安第斯国家、南非关税同盟、泰国等进行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

世纪挑战帐户集团也在不断打破记录。自 2004 年创建以来，它已经与马达加斯加、洪都拉斯、佛得角、尼加拉瓜、格鲁吉亚五个国家签署了援助项目协议，总金额达 9 亿美元。自 2003 年 2 月公布了世纪挑战帐户指数以后的两年来，世纪挑战帐户候选国家的成立公司所需时间中值数从 61 天降到 46 天。据世界银行的官员说，由于世纪挑战帐户的激励，巴拉圭在 2004 年进行了大幅改革，改进了"成立公司所需天数"指标，并且使注册公司数量大幅度增加，比往年多出百分之二十。

贸易自由化是成功的经济发展计划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份。美国致力于帮助其他国家实现经济致富，减少全球贫困。我们身处第一线，正在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与各个国家共同努力，更多地创造这种机会。我们在全世界的 135 个大使馆与领事处，都在努力推动这一政策。许多发展中国家现在意识到，贸易自由与经济成长相互关联，密不可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启动了支持这一努力的项目。我们有信心通过合作努力，在 21 世纪增进全球的经济繁荣。

职业环境变化

——采访丹尼尔·平克(Daniel Pink)



丹尼尔·平克

商务顾问、演讲人、作家丹尼尔·平克(Daniel Pink)撰写过两本颇受好评的书，探讨全球经济及其对全球人的影响：《全新思维》(A Whole New Mind)和《自由职业国》(Free Agent Nation)。此外，他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以及《快捷公司》(Fast Company)杂志发表过一系列文章，论及退出公司自行创业、外包、以及从工作中寻找价值意义等现象。作为《连线》(Wired)杂志的特约编辑，平克还为雅虎金融(Yahoo! Finance)写专栏。以下是美国国务院专职写作员保罗·马拉默德(Paul Malamud)对平克的采访纪录。

问： 在你看来，什么是全球化？

平克： 全球化是不同经济体、不同社会之间的大幅度互动，世界被技术发展更紧密地连在一起，并对资本市场、技术以及信息交流产生影响。

问：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平克： 我认为有几方面因素。其中之一是诸如互联网这样的新技术的到来：它使一个津巴布韦的孩子几乎能与剑桥大学图书馆馆长一样迅速地找到信息；它使人们更容易保持与母国的联系；它使资本在全球流动，到达能使资本得到最好利用的地方；它给政府和政治机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透明度；它减少贸易壁垒。在我的意识中，全球化的本质就是流动：无论是观念的流动，还是资本的流动、物资与服务的流动、人的流动——由于全球化，所有这些流动都变得更方便、更迅速。

问：我们的生活因此变得更好，还是更不好？

平克：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件好事，当然它不完美。我们不能把完美与好对立起来。总体而言，全球化提高了全世界的生活水平。显而易见，它也导致了某些紊乱。如果你是一个美国工人，你的制造业工作转移到某个发展中国家，那里工人的工资只相当于你的五分之一，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受到了全球化的伤害。



但在同时，这个制造业工人及其家人也因消除了贸易壁垒而得到商品与服务价格低廉的好处。显然，他们也从促成全球化的各项技术发展中获益。所以，我的观点是，全球化总体上是好的。对公共政策的挑战以及政治领导人所面临的国际与国内的挑战在于，要确保人民得到全球化的好处，与此同时，必须有政府和政治机构介入，减轻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问：有没有统计数据可以证明，全球化是水涨船高、全体受益呢？

平克：这要取决于按照谁的生活水平。当然，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过去的50年翻了两番。我可以肯定，在世界其他地方，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但尽管如此，这个星球还有10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一美元。所以，无论如何也无法说，所有人现在都生活在蜜罐里；但总体而言，全球化使事情变好，而不是变糟。因此，我几乎可以断言，一般来说，未来会比现在更好，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而恰恰因为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问：你在《全新思维》一书中预言，还会有更多的常务性白领工作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并且认为这种损失将会被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中的更多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所弥补。然而，这个前提是，大多数人都富有高度的创造力。假如我们大多数人并非如此呢？

平克：我不能认同人们不具有这种能力的前提。我的论据是，这些经济体将常务性的工作自动化和外包化，如基础会计，基础金融分析，甚至基础法律服务——这与我们在制造业所看到的情况一样。今天，任何常务性工作——任何可以简化用说明书、规格表、或者一套规则来做的工作，都将逐渐从美国、加拿大、西欧、日本

消失，因为这类工作可以用更廉价的方式完成，可以用电脑或由其他国家的人来完成。

这意味着，为了经济生存，人们必须从事比较非事务性的工作。这很可能是艺术性的、创造性的、富有同情心的、大格局的工作。我认为，无论是就人类整体而言，还是就美国人具体而言，要说他们不能有创造性、同情心和大格局，那是完全错误的。

举个例子。回想一下美国从农业经济向制造业经济发展的时候，人们曾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上高中，不是每个人都能读书写字。只有少数精英才值得受良好教育”。我的意思是说，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变成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译注)，但是人人都是可以变得善于运用这类抽象思维能力和发挥高度的感染力。我认为这是极其可以做到的。

没有人会说：“大众不可能识字”。尽管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译注)，但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识字。说“大众不可能识数”，对不起，我不能同意。我不认为人人都是爱因斯坦，但他们一定能识数。而且他们的能力不止于此。

问：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人达到了同样的教育水平，发挥他们自己的创造力，那么发达国家的人会如何呢？

平克：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汤姆·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作家兼《纽约时报》外交专栏评论员——译注)在他的文章中谈到了这点。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中国与印度正在把我们赶向深渊。另一种观点是，它们正在把我们赶上峰颠，弗里德曼持后一种观点，我也一样。它们会把我们赶上峰颠，并不是因为我是乐观主义者，而是因为那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模式，一向都是这种过程。当然，这并不是说将来情形百分之百肯定还会这样，但我是这样预测。

我也同意，美国人绝对不是唯一有创造力的人，因此美国人必须做的是，丢掉自我满足感，更上层楼，也就是像弗里德曼所说的，其他国家把我们赶上峰颠。

问：工作的性质也在其他方面发生变化，电脑越来越复杂，功能越来越强。你认为还有多长时间电脑就可以竞争乃至取代人类的专业级工作？

平克：我认为在某些方面，电脑是在做一些专业性的工作。比如，TurboTax(一种可以帮助纳税人填报税务表的软件)。我们都很关心外流和外包现象。去年，美国有300万个税务报表是由印度的税务专业人员在印度完成的，但是有2100万报表是由TurboTax完成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软件已经在做专业人员的某些工作了，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

这意味着会计师要生存，就不能继续做这件能够由 39.95 美元的软件完成的事，他们必须做那些很难简化成电脑程序的工作，也就是要从事更复杂的咨询事务，即理解客户有哪些财务需要，给他们提供更高层次的金融咨询。

这同股票经纪人与投资大致相同。现在，很多美国人自己上网投资。信息到处都有，互联网的股票交易相对便宜，因为你可以在自己的电脑上完成，而不再需要打电话请一个股票经纪人来进行日常交易了。

我想，到一定时候，股票经纪人要转成金融顾问，做到对顾客有更细致的了解，提供电脑永远无法提供的咨询。

问： 那么机器人呢？你认为机器人将如何影响现有的工作？

平克： 人们如果到一个制造车间就会看到，那里已经不是 20 年代、甚至也不是 50 年代的那种样子了，你看不到那种满身油污的工人在装配线上拧螺丝的景象。今天在那里看到的人往往都有学位，他们在管理那些机器人。机器人不能自我管理，也没有自己的意志。它们听软件程序的指令，这些程序指令必须由人来写，机器人必须由人控制。所以，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工作成为这类工作。显然，它要求更高的技术水平。

问： 是不是全世界的工人都有这种智力、智商来适应这一切呢？

平克： 请允许我对这个问题的前提表示一点不同意见，亦即智商是能力的尺度。智商只是某一种逻辑思维的尺度，但它远远不是唯一的逻辑思维方式。现在非常多的证据表明，智商与事业成功之间的相关性几乎是零。智商与你选择的专业有相关性。此外，标准的智商测验的分数在不断提高——智商中值数提高了。智商是才智的一个部份，但只是其中一小部份。我们有丹·戈尔曼(Dan Goleman)谈情商的著作，有哈佛大学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的著作以及他提出的多重智商的观点。所以，我不把智商看成衡量人类能力的尺度。

问： 你认为全球化的某些副作用会威胁到人类的尊严吗？有人提出，家庭、家族、社区、资历辈分等关系都在松懈——甚至一个人基于自身技术能力而取得的成就感也在贬值，因为在全球化经济中，角色变换太频繁了。

平克： 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如果说西方世界是未来的先驱的话，那么这里的家庭关系的确比世界其他地方松懈得多。人们有更大的流动性，不见得居住在父母生活的地方，也不见得居住在兄弟姐妹居住的地方。有一系列不同的家庭结构在向核心家庭形式提出挑战。说身份来源于一生所积累的技能——这很有意思。我认为它在发生变化。人们不可能扎在一个行业中 40 年不变地挣钱过日子，因为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任何技术的周期都在衰减。一套技术的生命周期实际上只有若干年。显而易见，必须学习，学习如何学习，不断提高。

至于这会不会有损人的尊严，我不知道。也许它会提高人的尊严。它使人不断进步，而不是停滞不前，使人有更多出成果的机会。显然，每个人的经历不同，这确实是个问题。

问：在《全新思维》中，你常用“她”来泛指人。你是否觉得全球化凸显了妇女的作用？你是否也有这样的意思：在新经济中，人类精神中的双性成份具有某种优势？

平克：有很多证据显示，那些具有双性思维方式的人，也就是，既可以运用典型的“左脑”男性思维方式，也可以运用典型的“右脑”女性思维方式的人，在现代经济中具有相对优势。我认为，有很多能力——诸如同情心，甚至创造性——往往因为被认为是“女性的”或者“柔性的”而被忽视，但它们今天实际上更为重要，并给女性略带来优势。我认为，未来的确属于那些具有双性思维的人，也就是，既有分析能力，又有艺术性和同情心。

问：真是这样吗？大多数人难道不是习惯于传统的性别区别吗？

平克：可以观察一下美国的军队，从许多方面而言，这是个男性的专业。但是，军队中有许多女性。今天军人所要执行的任务，有时要求比较复杂的技能。他们必须了解当地文化；会有维和使命——维护和平与战场作战是很不同的。我的看法是，所有人都有双性思维能力，而那些不愿意发展这一能力的人可能会陷入困境。

问：还有一个与全球化相关的变化是手机、互联网、甚至电脑游戏等更为普及。这种现象，单就趣味性而言面，也与全球化经济相连吗？

平克：很难讲。但是，即使电子游戏，如同任何形式的娱乐，也可以成为跨越不同文化的共同语言。手机提供的持续联系，可能与全球化有关，虽然它可能要算一个远亲。

问：你在书中说，全球化似乎在美国导致更多的精神探索。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平克：有非常大量的证据显示，当收入高于某种小康水平以后，更多的钱对提高生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作用十分有限，真正给人带来满足和幸福的是金钱以外的东西：满意的工作，密切的关系，过有意义的生活等。我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从生存斗争中解放出来，会有更多的人能够追求生活的意义、追求生活的目的和那种超越感。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威廉·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谈到“第四个大觉醒”(“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他讲述了对自我实现的追求如何从这个星球上的一小部份人扩大开来，在发达国家尤其如此。也有人把这叫做“追求意义”(“meaning-want”)，也就是，星球上的一部份人已经从“追求物质”(“material-want”)转到“追求意义”了。密执安大学的唐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称之为从物质主义价值

向后物质主义价值的发展。我认为，达到一定物质生活水平所带来的自由使人们能够追求更多的东西，这是一种享受。

问：在你早先的《自由职业国》一书中，你谈到在全球化的劳动大军中，为自己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你指的是什么？

平克：我把自由职业者定义为不是在大公司、大机构里做事的人——自由撰稿人，小业主、小生意人等。这种工作形式越来越普遍，这既有技术的原因，也有由个人与公司之间的契约关系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由公司内部的结构变化所造成的原因。刚才我们谈到的人们对生活意义的追求也是一部份原因。

这些因素促使很多人脱离大公司，谋求自我发展，也造成对其他人的推动。至于这些现象与全球化的联系，也许体现在它给人们带来的流动性。有些人为了北美的公司工作，但却住在欧洲或其他地方。招聘人才的范围不再局限于地方市场，而是可能面向全球，尽管这才刚刚开始。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我认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会给自己寻找新的工作方式，而不是永久性地依附于一个公司机构。



“在家上班有利有弊。”

© The New Yorker Collection
2000 Danny Shanahan from
cartoonbank.com 版权所有

美国文化是"美国的"吗?

理查德·佩尔斯
(Richard Pells)

理查德·培尔斯(Richard Pells)是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校区(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的历史学教授,也是以下三本书的作者:《激进愿景与美国梦:大萧条年代的文化与社会思想》(*Radical Visions and American Dreams: Culture and Social Thought in the Depression Years*);《保守年代的自由观念:40-50年代的美国知识分子》(*The Liberal Mind in a Conservative Age: American Intellectuals in the 1940s and 1950s*);《与我们不同: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人对美国文化的爱憎和改造》(*Not Like Us: How Europeans Have Loved, Hated, and Transformed American Culture Since World War II*)。他正在撰写的另一本书是:《从现代主义到电影:20世纪美国文化的全球化》(*From Modernism to the Movies: The Globaliz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他曾六度任富布莱特高级讲座学者和主席,并在荷兰、丹麦、德国、奥地利、芬兰、巴西、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作访问教授。

从20世纪初开始,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就对美国文化的全球影响感到不安。1901年,英国作家威廉·斯特德(William Stead)出版了一本书名颇具预示性的书:《世界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这个书名反映出一系列延续至今的忧虑,例如,民族语言与传统的消失以及国家自身的特征将在美国习俗与思维方式的重压下消声匿迹等等。



理查德·佩尔斯

近年来,全球化成为一些学者、记者与政治活动人士的大敌。他们对这种在他们看来是文化同一化的趋势深恶痛绝。而且,他们通常把全球文化和美国文化视为同义词,并且一直认为,好莱坞、麦当劳、迪斯尼等所传播的形像和潜意识信息具有如此之大的诱惑力,以至它们压倒了其他国家内部的竞争势力,从而正在摧毁地区和地方特征。

然而，过去 100 年来，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关系从来不是单向的。一如它是世界娱乐与品味的带头人一样，美国过去和现在也都是其他国家思想和艺术影响的吸收者。

事实上，从 19 世纪到 21 世纪，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不但输出全球文化，也接受全球文化。移民对美国的影响的确是美国文化能够如此普遍、如此长期流行的原因所在。美国文化得以在全世界得到传播，是因为它吸收了其他文化的风格与构思。比其他国家更胜一筹的是，美国将所接受的外国文化产品重新组合包装，然后重新传向全球。正因为这样，全球大众文化被与美国文化相提并论——无论这种做法是多么简单化。

其实，快餐、游乐园、电影并不是美国的发明。在“巨无霸”问世之前，已经有鱼和炸薯条；在迪斯尼乐园出现之前，已经有哥本哈根的蒂沃利公园(Tivoli Gardens；它被沃尔特·迪斯尼用作在加利福尼亚州安纳海姆建造第一个主题公园的样板。加州迪斯尼乐园的模式而后又被输出到日本和巴黎。)在 20 世纪的前 20 年里，意大利和法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影片输出国。

现代主义的影响

由此可见，今天国际流行的娱乐节目的源头，并不仅仅是巴诺姆马戏(P.T. Barnum)或布法罗·比尔的西大荒演出(Buffalo Bill's Wild West Show)。新的全球文化的根源在于 20 世纪初欧洲现代主义对 19 世纪文学、音乐、绘画、建筑的批判，特别是对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传统界线的否定。现代主义艺术表现为即兴、兼收并蓄、不屑虔敬。这些也都是美国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徵。

此外，在 20 世纪初，艺术家开始向艺术是提高文化和道德涵养的手段这一观念提出挑战，使哲学、宗教和意识形态让位于风格与技巧，刻意使人注意小说的语言，绘画的光色，建筑的材料与功能，音乐的结构而非音乐的旋律。

虽然现代主义最初主要是一个欧洲现象，但它在无意中加速了美国大众文化的发展。超现实主义及其虚幻般的相关意识，非常有利于创造广告、漫画、主题公园的文字游戏和心理象征。达达主义嘲笑精英文化体制的自命不凡，从而使已经存在的(特别是在美国外来移民观众中)对“低级”无谓的五分钱戏院影剧(nickelodeons)及流行杂耍剧的兴趣更得到肯定；而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对非正统的无调音乐的尝试，则体现出美国爵士乐节奏创新的效力。

现代主义为一种全新的文化奠定了基础。然而，这个新文化却既非现代主义，也非欧洲式；美国艺术家将一种前卫艺术变成了全球现象。

流行文化的融合体

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关系，在流行文化中至为明显。美国大众文化的发展有许多原因。毫无疑问，以美国为基地的传媒集团对其产品和发行的控制力是促使美国娱乐文化在全世界传播的主要动力。但是，美国的资本实力不是美国影视节目在全世界受欢迎的唯一原因，它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英语作为大众传播语言的效力是美国文化被接受的关键。与德文、俄文或中文相比，英文的结构和语法更简单，而且使用的短词汇多，抽象词汇少，句子更简洁，这些对于歌词歌曲创作、广告标题语言、漫画说明、报刊标题、影片和电视对白都具有优势。因此，英语非常适于美国大众文化传播的需要。

另外一个因素是美国大众的国际背景。美国人口的多元化，包括地域、族裔、宗教、种族的多样化，迫使美国媒体自 20 世纪初以来，不断对信息、影像、情节作出尝试，以便满足多元文化的需求。这意味着好莱坞电影制片厂、大众流行杂志、电视网等必须学会如何面向国内各类群体和阶层，从而也使它们掌握了满足海外不同消费者需要的技巧。

美国媒体能成功超越国内阶层界限、国界和语言障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吸收和融合不同的文化风格。美国音乐家与作曲家效仿毕加索(Picasso)和布拉克(Braque)等现代派艺术家，将雅俗文化兼收并蓄。阿伦·科普兰(Aaron Copland)、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和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在交响乐、协奏曲、歌剧、芭蕾创作中吸收了民间曲调、宗教旋律、蓝调、福音歌曲和爵士乐等。即使像爵士乐这样典型的美国艺术形式，在 20 世纪也同非洲、加勒比、拉丁以及现代欧洲音乐有越来越多的融合。美国大众文化的兼容性使其能够表现不同的经历和情趣，从而更加受到多元化的国内外消费者的喜爱。

欧洲对好莱坞的影响

论外来影响，在好莱坞影业最显著不过。无论其效果可取与否，好莱坞在 20 世纪变成了现代世界的文化之都。然而，好莱坞从不纯属于美国。如同佛罗伦萨、巴黎、维也纳等历史其他文化中心一样，好莱坞是国际化的，它由移民创业，并汇集着全世界优秀的演员、导演、编剧、摄影师、编辑、作曲家、服装设计师、场景设计师，等等。

不仅如此，在 20 世纪的大部份时间内，美国影业人员对外国导演的精湛作品十分倾倒，甘愿追随。从 40 年代到 60 年代中期，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米切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黑泽明(Akira Kurosawa)、萨蒂亚吉特·雷伊(Satyajit Ray)等，都是美国所崇拜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导演。

然而，一个不无矛盾的现象是，欧洲与亚洲电影业的最大成功表现在美国对它们的模仿。到了 70 年代，新生人才，如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

马丁·斯科西斯(Martin Scorsese), 罗伯特·奥特曼(Robert Altman), 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以及伍迪·艾伦(Woody Allen)等, 都是美国人。美国人的即兴手法和对自传体的热衷要归功于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和法国的新浪派(New Wave)。这些技巧的运用使美国电影业脱胎换骨, 美国影片的全球流行程度也变得更加令其他国家影片望尘莫及。

尽管如此, 任何时期的美国导演都在效仿外国艺术家和电影导演, 他们密切注意电影的风格与形式以及如何满足视觉叙述效果的需要。20世纪初的欧洲画家希望赏画人注意画布上的线条与色彩, 而不是将作品视为对自然实物的复制。同样地, 很多美国影片也刻意提醒观众, 他们是在看电影, 而不是在看影像化的现实。例如, 《公民凯恩》(Citizen Kane)采用了多重叙事形式; 《安妮·霍尔》(Annie Hall)以画面分割手法表现两个恋人各自的想像; 《低俗小说》(Pulp Fiction)则大量运用前后插叙。美国电影(包括音乐电视片)导演热衷于运用高难度剪辑和摄影技术——其中很多灵感来自外国同行——以组合出反映当代生活节奏与魅力的现代主义的视觉形象。

好莱坞对现代主义视觉效果沉醉, 从很多当代演员采用的无言表演方式得到突出体现。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在1947年的舞台剧《欲望之车》(A Streetcar Named Desire)和1951年的同名电影中的创新表演, 形成了美国表演艺术上的无言风格——这种内省沉思的表演是人们在30年代滑稽喜剧和强盗片中那些伶牙俐齿的男女主角身上绝对看不到的。

白兰度受到“方法演技”(the Method)的训练。这是从俄国革命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y)的莫斯科艺术剧院发展起来的一种表演技巧。它鼓励演员即兴创作, 调动儿时记忆和内在情感, 时常可以置剧作家的意图于不顾。因此, 以白兰度及其后继者为代表的美国艺术表演的感染力, 往往更寓于无言之中, 体现在对难以言释的强烈情感的挖掘。

“方法演技”不仅在美国有影响, 在海外也有影响; 让-保罗·贝尔蒙多(Jean-Paul Belmondo)和马尔切洛·马斯特罗亚尼(Marcello Mastroianni)的表演风格便是海外影响的体现。“方法演技”也典型地反映出最初用于舞台的一个外来观念, 如何在战后被美国的电影艺术吸收, 而后又作为电影与社会行为的新模式传播到全世界。另外, 更为重要的是, “方法演技”演员那种不注重语言、依赖形体姿态甚至以沉默来刻画角色的风格, 使全球的观众——即使英文懂得很少的人——都能够理解和欣赏美国影片。

人情味

美国文化不但模仿了现代主义的视觉夸张, 而且也效仿了现代主义的非政治化与反意识形态的倾向。拒绝向大众灌输某种社会意识, 是美国娱乐能在全世界流行的最重要原因。美国电影所表现的往往不是某个时代或某个地点的问题, 而是人与人的关系和个人情感, 通常以浪漫、阴谋、成功、失败、道德矛盾、求生等为故事主题。

最令人难忘的 30 年代影片大都是描写一些本不甚般配的人物如何阴差阳错堕入情网的喜剧片和音乐片(《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除外), 而不是反映贫困和失业现象的具有社会意识的片子。同样, 最精湛的二战故事片和越战故事片——如《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和《猎鹿人》(Deer Hunter)——之所以在战争结束很久以后仍然令人回味, 是因为它们挖掘了人物最深刻的感情, 而不是着眼于当时的实际事件。

影片中的人物遇到的磨难存在于各地人的生活经历中。欧洲人、亚洲人、拉丁美洲人争相看《泰坦尼克号》(Titanic)的情形, 令人想起当年《飘》(Gone With the Wind)所造成的轰动。出现这种现象不是因为这些电影宣扬美国的价值观, 而是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在这些爱情与失落的故事中看到自己生活的影子。

批评人士一向把美国大众文化说成是粗俗、带冒犯性的。但对外国人来说, 美国文化并非那么奇异。而且, 在最理想的情况下, 美国大众文化是把从别人那里接受的东西转化成一种能被世界各地所有人接受的文化, 使之成为让千百万人所喜闻乐见的既有感情魅力、有时也有艺术感染力的文化。

所以, 尽管今天不仅在中东, 而且在欧洲和拉丁美洲都有反美情绪抬头, 但应该看到, 美国的影片、电视节目、主题公园与其说是“帝国主义的”, 不如说是世界性的。归根结底, 美国的大众文化并没有把世界变成美国的复制品; 相反, 美国对国外文化的依赖已经使美国成为世界的复制品。

一位欧洲人看美国文化的影响

杰西卡·吉诺·赫克特
(Jessica C.E. Gienow-Hecht)



杰西卡·吉诺·赫克特

杰西卡·吉诺·赫克特是德国法兰克福大学(Johann Wolfgang Goethe-Universität Frankfurt am Main)历史学教授。她的第一本著作《不可能的传播：美国新闻在战后德国的文化外交作用，1945—55》(Transmission Impossible: American Journalism as Cultural Diplomacy in Postwar Germany, 1945-55)获得斯图尔特·伯纳斯(Stuart Bernath Prize)外交历史最佳处女作奖。她的第二本书《健全的外交：1850年以来德-美关系中的音乐与情感》(Diplomacy: Music and Emotions in German-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850)将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她曾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Bielefeld)、哈雷-威登堡马丁路德大学(Martin-Luther-Universität Halle-Wittenberg)以及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担任教职。

1981年上映的一部电影叫《诸神一定疯了》(The Gods Must Be Crazy)。影片中，一名飞行员在飞越非洲博茨瓦纳卡拉哈里沙漠(Kalahari Desert)上空时，将一个空的可乐瓶子丢到了一个部落的聚居地。当地土著人立即把瓶子看作是神灵的赐物。但是，这个“赐物”使他们的传统与社会习俗发生了糟糕的变化。最后，部落委派一名成员，把瓶子扔到他们认为的地球边缘以外。

这部电影为所谓“伟大的辩论”(The Grand Debate)——美国人是否是四处传播流行文化进而征服、腐化世界的“文化帝国主义者”——提供了某种洞见。

毫无疑问，正如理查德·佩尔斯(Richard Pells)所言，今天美国流行文化的内容大多来自 20 世纪其他国家的一系列影响。但是，这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抨击他们所认为的“美国文化帝国主义”；也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个观念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变得如此有势力。如果我们希望更好地理解这种现象，就需要既分析美国文化在海外的形态和影响——正如佩尔斯所做的那样，同时也考察其他国家的人是如何接受美国文化的。

历史背景

其实，这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有趣的矛盾现象——这个因文化传播而引起如此争议的国家，最初对输出文化并无多少兴趣。美国人历来认为，他们的独特之处主要在于政治体制，而非诗人、艺术家、小说家。美国人一般将流行文化视为个人娱乐，而不是外交政策工具。他们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在联邦政府内设立文化部。1938 年，美国国务院设立了文化关系处，但是，许多美国官员对这种将文化作为外交工具的做法持批评态度。即使在今天，大多数美国人仍然相信，文化属于创造领域，属于公众品味或自由职业的范畴，不属于政府的职能。



2005 年 4 月，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克罗克(Ryan Crocker)与巴基斯坦的富布莱特奖学金获得者交谈。(Anjum Naveed AP/WWP)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冷战时期，美国外交人士确定，美国需要在世界上倡导美国的生活方式。面对当时苏联在力图输出共产主义，美国的公众人物和决策者致力于利用文化来加强国际影响力。在欧战胜利日(VE-Day)以后的数年中，美国政府创立了一系列组织与项目，如美国新闻总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和富布莱特交流计划(Fulbright exchange program)等，以促进美国文化信息的传播。

当然，客观而言，美国并不是输出文化的第一个国家。从文艺复兴时期起，欧洲大国推行过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项目。英国在印度与中东、德国在非洲、法国在印度支那都曾将文化输出作为加强贸易、商务和政治影响的有力工具，并为各自的需要吸收精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1959 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被调查的 81 个国家中，有二分之一以上的国家，包括所有大国，都设有官方的文化交流项目。今天欧盟的一些活动所采用的便是集合文化外交手段，即创立各种促进语言与文化信息交流的组织。

阿根廷、墨西哥、埃及、瑞典、印度等国历来也向周边国家输出影视产品。而且，近年来随着一些好莱坞制片厂被外国公司接收，人们甚至感到，美国是否从“文化帝国主义者”变成了不幸的收购对象？但是，即使美国不是第一个输出生活方式的国家，外国批评家仍始终视美国是未来的恐惧所在。

例如，在 70 年代与 80 年代，西欧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反美抗议、和平组织以及反对美国军事存在的群众示威。欧洲的反美情绪很快扩展到文化领域。批评人士认为，美国产品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受消费者喜好这一范围；美国商品不仅占据了外国市场，而且也占据了外国人的头脑。对于欧洲的许多知识分子而言，大众文化、好莱坞电影以及消费主义似乎威胁到欧洲的主权、传统、以及基于印刷文化的社会秩序。大众文化好像模糊了社会界线，超越了民族国家界线，扩大了资本主义市场。

然而，当张三向你说道李四时，其实能让你更多地了解张三而不是李四。其他国家的人如何看待美国文化，也许更多地向我们说明了他们本身，而不是美国。

文化与全球化

今天，世界上许多政治人物与文化批评家为美国电影的大量涌入而哀叹。例如，在欧洲国家，这些人士担心本国文化特点将会消失，大批观众已经为美国产品所倾倒。1991 年，法国前文化部长雅克·朗(Jack Lang)在一次以“卫星越高，文化越低”为标题的采访中，强烈抨击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然而，这种批评并不新鲜。早在 70 年代，智利教授阿尔芒·马特拉特(Armand Mattelart)和小说家及文学评论家阿里尔·多尔夫曼(Ariel Dorfman)写过一本很有影响的小册子，题为《怎样解读唐老鸭》(Para leer al pato Donald)，揭露好莱坞对现实的歪曲，号召智利人民实现自己的文化解放。

有些小国、边远地区的民族或不知名的部落，由于高声抗议西方影响而成为国际瞩目的新闻焦点。这些消息告诉人们，从冰岛到拉丁美洲，从中非到菲律宾，很多地方的公共代表都在痛斥英美电视及文化影响给本土文化造成的衰落。

然而，从很多方面来说，“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这个观念是有欠缺的。美国社会学家约翰·汤姆林森(John Tomlinson)提出，这种现象也许仅仅是现代化发展的结果；是这种发展而不是文化扩张导致地方文化消失。全球的技术和经济进步以及全球化的融合，降低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因此，把全球范围的发展归咎于某一个国家是有误导性的，应该说每一个国家都受到了全球文化变迁的影响。

未来，“全球化”一词很有可能取代美国文化帝国主义而成为新的众矢之的。全球化一方面意味着地球在缩小，另一方面意味着地球日益被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虽然许多人认为全球化只是一种经济现象，但是，它的因果效应确实是多方面的。这个语义含糊的词涵盖了现代化的多重特征，如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展，技术以及科学理性的传播等。然而，其核心思想没有变，即文化与社会并不必然与民族国家的疆界重合。换言之，现代大众文化的传播也许并不是美国使然。

最近几十年，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国际批评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反美基调，转向更加国际化，目标不具体。甚至那些美国的主要批评家也向这个方向作出调整。早在 1980 年，阿尔芒·马特拉特就对“文化帝国主义”被滥用提出警告。他强调，这个词

并不意味着外来势力的阴谋；那种情形只有在国际与地方(精英)力量结合在一起时才会出现。

如果美国文化主宰这一观念如此令人置疑，为什么几十年至今，反美主义在几乎所有地方都大肆膨胀呢？究其原因，与其说与美国有关，不如说与抗议者自身有关。在某种意义上，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文化反美主义，对这一现象的表达方式各式各样，受制于地理环境与历史周期的影响。现象的形态与内容不但因地而异，而且因时而异：每个时代、每个群体都有各自的反美形式。在 20 世纪，这些批评大多集中在美国文化输出的经济层面；在 21 世纪，人们似乎更担心美国强权的全球政治影响。

法国的反美主义在冷战时期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裂中产生。当时社会舆论谴责美国的扩张主义、北约、以及所谓美国艺术的腐蚀性影响——这些是令法国精英，而不是选民大众，惊恐不安的问题。相反，“美国的生活方式”对那些热衷消费主义和提高生活水平及经济增长的法国年轻一代来说，有着强大吸引力。

法国的例子很有代表意义，因为它反映出文化反美主义的根本矛盾：在任何时期，反美主义一向与崇美主义形影并存；只有反美而无崇美的现象，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都是不可思议的。反美主义与崇美主义的对立代表了两者相互依存的必要条件：高度期待与极度失望一向相互交织。

大多数强国都有过这样的基本历史教训：强权导致怀疑，一个强国的影响越大，其他国家就越反感。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时期，甚至在冷战期间，一些政治与文化观察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提醒美国的决策者注意这种势态的后果。正如美国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所言，随着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其他国家的人不可避免地“憎恨那些凌驾于自己之上的人”——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是如此。当我们思考全球化以及美国的作用时，也许应该记住这位智者的话。

全球化、人权、民主

丹尼尔·格里斯沃尔德
(Daniel Griswold)



丹尼尔·格里斯沃尔德

丹尼尔·格里斯沃尔德(Daniel Griswold)是位于华盛顿市的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贸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他在贸易、移民、全球化领域著述甚丰, 2004年1月发表的研究成果《以自由换专制: 开放市场如何为民主耕耘》(Trading Tyranny for Freedom: How Open Markets Till the Soil for Democracy)登载在 www.freetrade.org。

美国国会或媒体在讨论贸易和全球化问题时, 一般注重于它们对国内经济的影响, 如制造业、就业机会、工资等。但是, 贸易的内容远远超出大豆或机床出口, 而是涉及自由与民主的输出。

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 布什政府清楚阐明了这样一个论点: 贸易能够而且一定要发挥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主与人权的促进作用。在2002年4月的一次演讲中, 布什总统说: "贸易带来自由的习惯", 这些习惯"引发对民主的预期和对更好的民主机构的需要。那些对境外贸易开放的社会, 在境内也对民主更加开放"。

贸易、发展、政治改革

贸易、发展与政治改革的关系并不仅是一句套话。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中, 经济与政治自由都是相辅相成的。从亚里士多德到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历代政治哲学家都提到, 经济发展与中产阶级的壮大可以为民主成长提供更肥沃的土壤。

贸易与全球化可以增加人民的自由, 使他们能更多地把握自己的日常生活, 进而促进政治改革。在不太发达的国家, 市场的扩大意味着人民再也没有必要去贿赂、乞

求政府官员批准进口一台电视机或某些拖拉机零件。外汇管制再也不能限制他们出国旅行。他们更容易获得各种通讯手段，如移动电话、互联网、卫星电视、传真机等。

在比较开放的国家，无论是工人还是制造者，他们的生活都较少受政府当局支配。例如，在一个比较开放的、市场主导的经济体中，政府将无法按照自己的好恶去阻止独立的报纸印刷某些内容。在相对开放的经济和社会中，全球媒体的"CNN效应"以及消费者的关注将有助于揭露和阻止那些虐待工人的行为。此外，跨国公司在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比在在封闭的发展中国家更愿意提供有竞争力的待遇和工资。

经济自由与收入增加，又将有利于形成有较高文化程度和更强政治意识的中产阶级。作用日益显著的商业阶层，加上更富庶的公民社会，将在政府之外的有影响力的领导和实力中心。经济上的自由将会使人们渐渐希望和期待行使自己的政治与公民权利。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把公民与世界隔绝开来的政府更容易实行控制，不让人们获得可用来挑战当局的资源和信息。



2004年10月，皮货出口商哈格斯(Girma Hagos)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阅读网上新闻，了解即将进行的美国选举。
(ANTHONY MITCHELL
APWWP)

更多民主化

正像理论所预示的那样，在现实中，贸易、发展、政治及公民自由是相互关联的。人人都同意，世界比三十年前更为全球化，但很多人并没有充份意识到，世界也比30年前更加民主化。根据人权研究机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最新统计，近30年以来，世界上享受完全的政治及公民自由的人口比例有了大幅增加，同样，世界上民主政府的比例也在同期大幅增加。

这个人权研究机构在2005年12月公布的年度报告中说，46%的世界人口现在生活在"自由"国家，此类国家的公民"享有公开的政治竞争、尊重公民自由的气氛、非常独立的个人生活以及独立的媒体"；而在1973年，只有37%的世界人口享有这些。在同一时期，一贯压制政治与公民自由的"非自由"国家的人口比例，则从47%下降到36%。"部份自由"国家的人口比例没有任何变化，仍然维持在18%。在此时期，民主政府在上世界上所占比例达到64%，这是自从自由之家33年前开始统计以来，民主政府达到的最高比例。

在很大程度上借全球化的自由之风，过去30年中世界11%的人口从"不自由"转变到"自由"，这意味着今天又有6.5亿人享受到美国、日本、比利时等国家的人所习以为常的公民与政治自由，不再遭受我们仍在专制国家看到的那种暴政。

从各个国家的内部看，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也是相连的。加图研究所 2004 年进行的以自由换取暴政"的课题研究发现，那些对全球经济保持开放的国家，远比不开放的国家更有可能实行民主，亦即更尊重公民及政治自由。与这些开放国家相比，那些相对封闭的国家更倾向于系统地剥夺公民及政治自由。

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

过去 20 年以来，一些经济体沿着经贸改革的路子，走向政治改革。仅在八十年代，韩国和台湾都还是在专制制度统治下，不允许有什么公开异议。在经过若干年的贸易发展与收入增长之后，今天的韩国与台湾都是多党民主制，实现了百分之百的政治及公民自由。还有很多国家正在大力推进这种双轨道的改革，如智利、加纳、匈牙利、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拉圭、葡萄牙、坦桑尼亚等。



机器人骑骆驼。这是 2005 年 4 月卡塔尔首都多哈正在进行的机器骑手测试，以期用机器人取代儿童当骑手的传统。(KAMRAN JEBREILI AP/WWP)

换言之，政府一旦给予公民更多从事国际商务的自由，就将越来越难以剥夺公民的政治及公民自由；而那些对国际商务设置关税及各种壁垒以"保护"其公民的政府，更容易剥夺上述自由。当然，经济开放与政治自由的相关性并非一模一样地体现在所有国家，但是这个总体趋势是毋庸置疑的。

将这一点应用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即是：贸易与发展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收益，可以成为在全世界推广自由与民主的利器。

比如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与全球化使政治改革有了希望。经过 25 年的改革与快速发展，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他们第一次在拥有住房、出国旅行、与他人进行经济企业合作而不受政府控制等方面享有独立。在过去十年中，电话装机、移动电话、及互联网使用者的人数巨幅增长。每年有数百万的中国学生与观光客到国外旅行。这对于中国的个体自由而言是好消息，但对于政府而言是日益增长的问题。

在中东地区，自由贸易与全球化也可以起到促进民主与人权的作用。在 2003 年 5 月的一次演讲中，布什总统阐述了他的中东自由贸易区计划，他说："阿拉伯世界具有伟大的文化传统，但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进步中损失了机会。展望全球，自由市场与贸易有利于战胜贫穷，并使男女老少形成自由的行为方式"。

中东地区的经济停滞滋生恐怖主义，这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缺乏改善未来的机会与希望，对年轻人尤其如此。这些年轻人既不能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也无法参与政治程序，进而成为宗教极端主义者及恐怖分子现成的征召对象。任何致力于促进中东自由的努力，都必须包含促进经济自由与开放的议程。

未来

在多边层次上，通过世界贸易组织达成的协议，将为民主与人权创造更为友善的全球气候。不发达国家通过开放相对封闭的市场，通过获得对富裕国家的更多市场准入，能够实现更高的增长率，发展壮大中产阶级，而后者是大多数民主国家的中流砥柱。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贸易谈判开始于 2001 年，它的成功落幕将会强化过去 30 年的两大趋势：全球化及政治与公民自由的推广。但如果谈判失败，也势必会在这两条战线上耽搁和影响数百万人的进步。

30 年以来，全球化、人权、民主联手向前进，虽然步履蹒跚，且不是在每时每地齐头并进，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一切都明确无误地显示，它们是相互关联的。在不发达国家中促进全球化，不但有利于提高增长率和收入，促进生活水平提高，使穷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而且，我们也在传播政治和公民自由。



一个被救出的儿童奴隶坐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市的一个恢复中心。近年来，国际社会的关注使数以百计的儿童奴隶获得自由。

(CASSANDRA
VINOGRAD
APWWP)

犯罪与恐怖主义的全球化

路易丝·谢利
(*Louise Shelley*)



路易丝·谢利

路易丝·谢利是位于华盛顿市的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外交学院教授，也是该校跨国犯罪与腐败研究中心(*Transnational Crime and Corruption Center*)的创建人兼主任。作为著名的跨国犯罪与恐怖主义问题专家，她著有《维持苏维埃社会治安》(*Policing Soviet Society*)和《犯罪与现代化》(*Crime and Modernization*)等书，以及关于跨国犯罪问题的诸多文章及书籍章节。

二十世纪末新出现的一个现象是，犯罪、恐怖与腐败同时全球化，可谓构成了“非神圣三一体”。这种现象不但可以在最贫困的拉美与非洲国家看到，而且也出现在繁荣的欧洲腹地。从拉美的三边地带到西非的冲突地区，从前苏联到西欧的监狱，犯罪与恐怖团体在联手运作，而腐败则为其推波助澜。犯罪与恐怖主义活动也在澳大利亚、亚洲、北美地区相互交织。刑事案的证据显示，这种融合是广泛存在的。

这个非神圣三一体的复杂性在于，它不单纯表现在恐怖分子以犯罪活动养恐怖活动，也非仅表现为有更多的非法货物在国际流动。应该说，这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全球化的犯罪网络与恐怖分子相互合作，靠着四处的腐败，两者都能成功运作。

在犯罪与恐怖主义之间进行人为区分的做法其实是基于对两者的过时概念。那种所谓犯罪分子犯罪是为利润，而恐怖分子完全是为政治目的的观点，不符合今天的现实。事实上，犯罪分子不再属于像西西里的黑手党(Mafia)和日本黑道(Yakuza)那样的对国家不构成威胁的等级森严的组织。恐怖分子常常通过犯罪来维持自身，在犯罪分子与恐怖分子之间频繁变换身份。两者的联网结构使犯罪分子与恐怖分子得以

联手，彼此不一定清楚对方的背景，但双方可以直接合作，或通过各自的协助关系联系。例如，在洛杉矶市，那个为 9.11 劫机者提供签证文件的语言学校，同时也为一个大型人口走私集团的妓女提供了签证文件。反过来，这个走私集团从事的身份盗窃活动，可以为恐怖活动提供便利。

有人以为所有这些都是全球化带来的，其实并不然。有组织犯罪与恐怖主义历来都有跨境活动。早在 30 年代，美国的意大利黑手党成员就到日本神户和中国上海从事毒品交易；此外，美国有许多犯罪团伙成员为躲避美国执法部门的追踪而逃到中国。爱尔兰共和军(Irish Republican Army)的成员得以在境外的爱尔兰人社区避难，这些海外社区还向爱尔兰境内的爱尔兰共和军组织提供资金援助。

但是，不同过去的是，如今这两种形式的跨国犯罪活动的交往速度加快，频率增高，其紧密合作程度今非昔比。

犯罪分子与恐怖分子都发展了国际网络，将其活动、计划、后勤分散到世界各大洲，使基于单一国家的法律体系难以应付形形色色的国际犯罪活动。国际犯罪分子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全球人员、资金、物资流动的增加为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在人、财、物方面的流动提供了绝好的掩护。恐怖分子与跨国犯罪集团为占领市场、保持活动和不被发现而变得全球化。



2004 年 6 月，一些矿工在塞拉里昂东北部靠近几内亚边境处淘洗钻石。由于该地区的这些“冲突钻石”被用来资助当地的血腥武装斗争，联合国从 2000 年至 2003 年 6 月禁止塞拉里昂出口钻石。

(BEN CURTIS AP/WWPPhotos)

全球化联系

国际有组织犯罪将其活动全球化的原因与合法的跨国公司全球化的道理相同。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建立分公司是为了利用劳工及原材料市场的好处；非法生意也是如此。无论合法还是非法，所有国际商家为满足生产、销售和发行需要都要建立全球设施。由于通讯及国际运输业的变革，非法企业能够扩大大地域，利用新经济环境中的优势。同样，恐怖分子也变得全球化，从而在国际上招兵买马，与海外侨社比邻而居，并得到后者的后勤与财力支持，还可以同较富有的社区发生联系。

冷战的结束对跨国犯罪的崛起具有重大影响。伴随超级大国对抗的结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但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区域性冲突大幅增加。不幸的是，这些冲突的武器与人力来源往往是通过毒品、钻石、人口等非法贸易，与跨国犯罪活动相关。这些冲突导致空前数量的难民，进一步破坏当地的合法经济，于是那里便沦为恐怖分子招募成员的理想地区，或成为恐怖分子从事策划和训练活动的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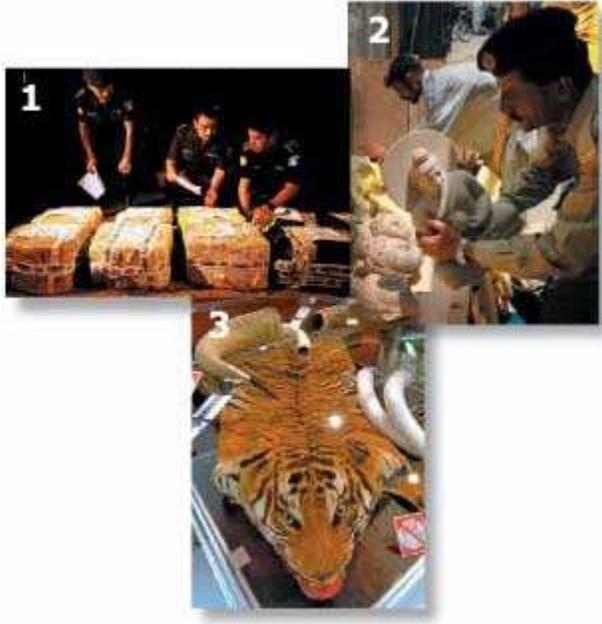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科技突飞猛进，十分有助于国际非法活动的发展。民航交通的兴起，通讯业的发展(包括电话、传真和快速的互联网通讯)，以及国际贸易的增加，都方便了货物与人员的即时流动。犯罪分子与恐怖分子充份利用互联网聊天室的匿名制以及其他电脑通讯手段，计划和实施恐怖活动。9.11事件的恐怖分子就是利用公共电脑发送信息，购买机票。同样，哥伦比亚的毒品走私犯运用加密的电子通讯手段来策划和完成交易。

全球化的发展带来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的意识形态，并使国家干预减少。提倡全球化的人士认为，进一步减少国际监管、贸易壁垒与投资障碍，将会增加贸易，促进发展。但是，有助于全球化的这些条件也对犯罪活动的扩张有重要意义。犯罪团伙与恐怖分子利用监管的大幅减少，利用边境控制的松懈，利用由此而来的更多自由来扩大其跨境活动，并向世界其他区域扩展活动空间。他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频繁，联系速度越来越快。虽然合法的贸易发展始终受到边境控制政策、边境官员、以及官僚体制的管理，但跨国犯罪团伙却随意利用国家法律体系的漏洞，把手伸向四方。他们前往那些无法引渡他们的地方，在法制不彰、执法不力的国家建立活动基地，在实行银行保密或缺乏有效管理的国家从事洗钱活动。通过化整为零，这些犯罪分子与恐怖分子收获着全球化的好处，并在同时降低了运作风险。

20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贸易突飞猛进。在合法商品的大量流通中，非法商品也在增加。如何在合法物流中发现非法物流，是巨大的挑战。船运货物集装箱被检查的比例非常低，这为毒品、武器、假冒品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因此，金枪鱼船可被用来运毒品而逃过检查，蜂蜜公司可被基地组织利用调遣资金、创造利润。

最近几十年，各种形式的全球犯罪均有所增加。毒品交易是第一个利用全球化某得最大利润的非法行业。犯罪分子从毒品交易中获取暴利，许多恐怖主义团体则把毒品走私作为资金的重要来源。但是，由于毒品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国际执法力度不断加强，毒品走私的利润也因竞争与风险增加而下降，犯罪分子与恐怖分子进而转向可以利用全球化经济之便从事的其他形式的犯罪活动。他们通过更多的军火走私及人口贩运捞到大量经济好处。此外，濒临绝种物种的非法贸易，危险废弃物的非法交易，盗窃艺术品及古董的交易，假钞交易，以及信用卡的全球化犯罪等，都有明显上升的趋势。犯罪团伙与恐怖分子插手于所有这些活动，有时甚至连贯作业。

此外，一个相当规模的服务业应运而生，专门为各种各样的跨境犯罪提供服务，其中包括提供假文件、洗钱，甚至还有高级专业人员为犯罪分子与恐怖分子提供法律、金融以及会计服务。位于华盛顿市的里格斯银行(Riggs Bank)便是一个例子。这家银行的合法顾客曾包括美国历任总统以及诸多国际社会的外交官，但在近年它受到为赤道几内亚的独裁者洗钱和协助恐怖分子转移资金的指控，并因此被罚款2500万美元。这个案子说明，犯罪分子与恐怖分子的活动并不是一贯躲在地下经济中，而是常会与合法的经济体系交织在一起。



1. 警官查验 2005 年 11 月在危地马拉截获的 200 公斤可卡因。(Jesus Alfonso ©AP/WWP)

2. 一位巴基斯坦海关官员检查 2005 年 6 月在卡拉奇没收的近 1500 件古董，这些古董价值达数百万美元，走私者已被逮捕。

3. 2004 年 10 月，联合国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大会，会上展示了虎皮及其他实物。

怎么办？

在国际安全问题上，必须对思维模式作重大改变。如果我们继续坚持那种过时的人为区分方式，即犯罪分子的动机是利润，恐怖分子的动机是政治与宗教冲动，那么，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执法机构以及军事战略家就不能有效打击这种新的广泛存在的跨国犯罪网络。

各国政府以及国际多边组织必须摆脱冷战时期的旧安全模式，即把民族国家冲突看作是对国际安全的主要威胁，并因此认为可以由各个国家来控制国际安全。例如，用把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材料统统封锁的方式来控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这也许是英明的战略构想，但却有着致命的缺陷，因为，如果不考虑由腐败泛滥和犯罪分子与恐怖分子网的活动带来的威胁，那么，国家控制其实是给人一种安全假象。

解决相互交织的全球犯罪、恐怖主义与腐败问题，就必须解决产生和扶持它们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环境。这三大邪恶全都与下列问题紧密相关：国家间的经济不平衡，专制政府，以及世界许多区域缺乏机会。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必须认识并解决激起恐怖活动的失落无助感，在伊斯兰教人口中尤其如此。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来说，就业机会与谋生手段极其重要，一旦有了这些——例如阿富汗和拉丁美洲的农民，就不必再靠种植毒品养家糊口。

犯罪常常被误认为是恐怖主义的边缘问题之一。2001 年 9 月 11 日以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把无数资源从对付跨国犯罪转移到反恐斗争中。对于军方和情报界等而言，这可能是一个严重错误。打击犯罪不是一个边缘问题，而绝对是反恐斗争的核心所在。例如恐怖分子在 2003 年 3 月 11 日制造的马德里火车爆炸案，如果监

狱当局事先有足够的敏感而注意到狱中进行的阴谋策划，那么它也许是可以防止的。

洛杉矶警察局的策略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洛杉矶警察局将地方警力与联邦执法机构的力量相结合，将专家分析与传统警方工作相配合，并密切注意地方犯罪活动，成功地挫败了可能发生的恐怖活动以及那些向恐怖主义提供资金和协助的组织。通过扩大合作，减少官僚壁垒，洛杉矶市警察能够在既没有专门法律手段、也未违反任何法律权利的情况下，打击恐怖主义。

如果跨国犯罪分子与恐怖分子等非国家的犯罪和恐怖势力的威胁在未来几十年中继续上升，那么，未来我们就必须有更加密切的国际合作，更为协调的立法措施，以及更多的情报交流。在实行反跨国犯罪和反恐怖主义的政策的同时，我们仍必须尊重人权，避免采取那些更加导致激进化或滋生恐怖主义的措施。我们如何把握这一模式的转变，认识到犯罪、恐怖分子与腐败的有机联系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将决定我们能否成功地保存全球化的优势，不使其在国际安全领域中受到危险的利用。

全球健康相关性

D.A. 亨德森
(D.A. Henderson)



D.A. 亨德森

D.A. 亨德森医学博士是匹茨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医学与公共卫生学教授，也是生物安全中心(Center for Biosecurity)的专职研究员，并担任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的顾问，为如何应对公共卫生紧急情况提供咨询。他曾经担任世界卫生组织(WHO)消灭天花病项目的首席医务专员。

过去 20 年中发现的新传染病数量惊人。其中有些只危及少数国家，而艾滋病则传播广泛，最终成为一种全球传染病，是世界第四大致命疾病。连同其他一些崭露头角的疾病，新疾病总共至少有大约 30 种。将来还会出现更多的传染病，这是因为最近几十年以来，人口、技术与社会发生的剧烈变化，使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发生重大改变，而且这种变化越来越快。

禽流感传播是当前十分令人关注的全球性威胁；这种新流感病毒对所有国家都构成严重威胁。它也清楚显示了全球技术进步能够加速疾病传播。但另一方面它也说明，可以通过全球合作形成有效的对应措施。流行性感冒每年都在全世界暴发，这是正常现象。虽然这些流感能够给高龄和慢性心、肺病人带来严重影响乃至死亡，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流感造成的不过是一个星期左右的发烧和呼吸道症状。然而，每隔 30 年左右，就会有一种新的、不同类型的流感出现，形成全球传播，导致大范围的流行病，统称大规模传染病(pandemic)。

让国际健康规则
适应缩小的世界

禽流感的威胁

国际海啸预警合作

最严重的大规模传染病之一发生在1918年，当时出现的一种比以往流感都更加致命的新型流感病毒，导致全球至少5000万人死亡。1997年，随着一种新型的、威胁力更强的H5N1禽流感病毒第一次在香港出现，人们对暴发大规模传染病疫情的担忧也再度升起。禽流感对禽类，特别是鸡，非常致命，但是它也导致了18个人患病，其中有6人不治死亡。从来还没有一种流感能导致这样高的病人死亡率。所有的病例都发生在与病鸡有接触的人当中。

幸运的是，当时这种疾病没有形成人际传染。公共卫生当局很快扑杀了数百万只活鸡，病毒似乎也随之消失。然而不幸的是，六年以后，同一病毒重现于鸡群中，并很快在东南亚传播开来。数千万鸡或因病死死亡，或因控制病毒扩散的需要而被扑杀。大约有150个人体感染病例，其中约一半不治死亡。几乎所有病人都与病禽有过密切接触或者照顾过病患。

野禽也受到感染，而候鸟的迁徙则把病毒传播到西亚、东欧与非洲。伴随病毒的继续传播，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担心，在某个时候，这种病毒会改变性质，开始在人际传播。鉴于如今航空旅客人数众多，可以断定，病毒能够在几个星期内扩散到全球。

为预防这种疾病传染，必须开发疫苗。但是，疫苗要有效，就必须与在人际传播的禽流感病毒相象，但这个病毒现在还不存在，至少科学家还没有发现它。因此，实验室、公共卫生人员以及有关行业正在加强国际合作，以期做到在病毒刚开始在人际传播，就能够发现确定它，并运用疫苗生产的新方法，迅速生产出大量疫苗。



2005年11月，一位研究人员在中国北京展示人体禽流感疫苗。

(AP/XINHUA/WWP)

全球合作的必要性

流感威胁很好地说明，为做到无论病毒在哪里出现都能够及时予以发现和应对，需要有更多的国际合作。这种合作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紧要。在微生物世界，无数物种不断以天文数字的速度自我繁殖，为自己的生存而不断变异、适应、变化。它们当中必然会不时出现变异类型，其中有些对人类有致命威胁，有些则具有快速生长与传播的能力。在农业社会中，人口居住分散，小城镇与村落人口稀少，新的传染病在人际传播的机会低得多，因而很快会自灭。那时候，即使在某个地区或国家发生了一种新疫情，但因为人类交通旅行不便，它的传播受到限制。如今，十分便利的全球旅行会将最危险的传染病四处扩散；但另一方面，通讯的进步可以为寻求治疗合作带来方便——这就是全球健康的相关性。

今天，疾病的出现及暴发，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也不管在哪里发生，都有可能对全世界人的健康构成威胁。全球各主要城市之间的距离都在 36 小时以内。2003 年，国际航空旅行大约有 6.42 亿人次，进出于 135 个国家的 750 个航空港。2003 年的非典(SARS)流行情况证明，过去常见的边境控制与检疫对于预防传染病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当时对 3500 万乘客实行了检疫程序，以隔离那些发烧的人，但没有发现一例非典。被感染的旅行者很可能处于无表象的潜伏期，无论任何甄别措施都无法识别。我们今天的人口流动规模和速度是史无前例的。

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也使新型微生物的生存机会大大提高。在 50 年以前，世界上只有纽约与伦敦两个城市的人口超过 700 万，只有 20% 的人口是城市居民。今天，人口超过 700 万的城市有 30 个，其中有 7 个城市的人口超过 1500 万。许多这类大都市座落于热带或亚热带地区，那里居住拥挤，营养不良，卫生落后，环境污染，是疾病滋生的肥沃土壤。

另一个导致疾病传播的主要因素是，工业化与食品供应国际化。几十年以前，大部份食物在当地的小农场生产，其储存与商业消费都是小规模，几乎没有国际贸易。如果一个地方的食品发生问题，只有很少人受到影响。但是，今天采用的是大规模食品生产与加工，而且也会有冷冻及空运食品，因此，食品生产链上的任何一环出问题，都可能导致跨国界的大规模泛滥。举一个小例子来说：在 2004 年 8 月，仅因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一家备餐厨房受到导致严重腹泻的志贺氏菌痢微生物(shigellosis)的污染，有 241 人确诊患病，实际病例估计 9000 个，涉及 219 个航班，波及美国的 24 个州以及四个其他国家。



另外一个常常被忽视但十分重要的传染途径是医院的普及，尤其在那些经济资源有限、专业医护人员稀缺的国家与地区。这些医院大多没有隔离传染病人的条件，也没有足够的设备进行针头与注射器的彻底消毒，手术设备不足。这种情况可能导致血液疾病的传播，而这的确是加速艾滋病在一些国家传播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在这些地方，常常会有居住分散的大批家庭成员与朋友从远方来到医院探视病人，从而常常造突发性流行病向大片区域迅速传播。最近的一些例子显示，医院是麻疹以及由拉塞(Lassa)、艾博拉(Ebola)、马堡(Marburg)等病毒造成的出血病传播的主要场所。

一名阿富汗青年坐在喀布尔市的标语下。标语上写道：“抵御艾滋病病毒/艾滋病，人人有责”。(MUSADEQ SADEQ AP/WWP)

在全球化时代，这个星球上每一个人的健康都与其他人的健康息息相关。人们尚未充份认识到这一事实，但艾滋病和禽流感对宣传这一点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必须在传染病刚一出现之际——无论在什么地方——立即作出反应。例如，今天发生在非洲或美洲某个边远地区的传染病，明天就可能出现在世界几乎任何一个地方，使人发

病，乃至暴发疫情。作为实际措施，2005年5月，国际卫生组织修订并通过了《国际卫生条例》(WHO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这是一个积极步骤，引导国际社会为应对任何地方发生病情而展开共同研究与开发，并建立有效的科研与教育国际网络，从而使重要的发现与观察结果得到更迅速有效的交流和实施。

高等教育中的全球问题

斯蒂芬·海尼曼
(*Stephen P. Heyneman*)

斯蒂芬·海尼曼是位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国际教育政策学教授。他经常在专业刊物上发表文章，曾在世界银行任职22年，足迹遍及几十个国家。



Stephen P. Heyneman

全球化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也影响我们的应对方式。比如，在70年代，依靠政府财政手段刺激经济成长的做法屡见不鲜。但在今天，私人投资额超过了外国援助与政府资助。

同样，过去，企业的决定往往取决于附近的、同一语言环境中的供应源。今天，企业决策根据的是全球比较优势。一个电脑装配厂可以坐落在美国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也可以在北爱尔兰或马来西亚；一个纺织厂可以建在印度的班加罗尔或墨西哥的索诺拉；一个冬季水果农场可以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智利或摩洛哥。

教育雄心

全球化也影响着高等教育。今天，几乎每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都有三个雄心。第一个雄心是，要求提

高入学率。世界各国的高校入学率在迅速增长。在60年代末期，适龄青年(18至22岁的)的高校入学率在西欧没有一个国家超过8%；而今天，西欧则没有一个国家的适龄青年高校入学率低于35%。全球的高等院校入学率每年增长10%到15%，其中包括在中低收入的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国家。

其结果是：高等教育几乎在任何国家都不再是“精英”教育——“精英”教育意味着同龄人入学率低于15%。高等教育成为“大众教育”。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Autonoma de Mexico)的在校生有26万9千人；印度的德里大学(University of Delhi)有30万9千名学生；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大学(Anatolian University)有100多万名学生。伊朗的伊斯兰自由大学(Islamic Azad University)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私立大学，它有145个校园，85万名学生。高等学府给人的传统印象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在那里受教育的是少数幸运儿。这种印象需要改变。实际上，今天的高等教育经历常常是非个人化和不具人情味的——学生排着长队进入陈旧的演讲大厅，图书馆藏书残缺不全，墙有裂缝，油漆剥落，水龙头漏水。

第二个雄心是，每个国家都想改进高等教育的质量。十年以来，定义高等教育质量的标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要求教室、学生宿舍、图书馆、科学实验室、学习厅等都具备现代化的电子设施。学生年龄略大一些，半工半读，住所远离校园。高质量的教学大纲不再基于教科书，而是依靠来自印刷或电子资源的最新信息。提供给学生的信息经扫描放到网上，他们无论住在哪里或在什么地方旅行，都可以了解课程情况。

另外，授课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课堂上不再以向学生教授信息为主，而主要用于分析学生在课前已经了解的信息。互联网等电子手段改变了大学图书馆，提高了服务质量。师生则不必像过去那样常去图书馆。过去，大学图书馆

的质量取决于藏书量，现在则取决于它提供多少获取信息的途径。每个高质量的大学图书馆都拥有充份资金，加入各种专门的"信息网"，从而可以分享藏书。

大学图书馆的网络是跨国的，欧洲、亚洲、北美洲的大学图书馆亦在其中。信息获取能力是优秀图书馆与平庸图书馆的区别所在。所有学术服务，包括授课与书名索引等，皆通过宽带设备传送。实际上，现在大学排名榜包括宽带容量(参见附表)。就质量而言，宽带容量低的大学是无法与宽带容量高的大学竞争的。

全球大学的第三个共同雄心是，更加公平化，即向那些来自贫困家庭及地区的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与助学金。许多一流大学资金充足，可以为三分之一的学生提供多于政府补贴额的奖学金。

财政资源

但是，实现这三大雄心是十分昂贵的，几乎在任何国家都无法完全靠公共资源达到目标。随着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以及对质量与公平的预期不断提高，公共资源无法满足需要，而且这种短缺很可能将长期存在。由此带来一个全球性难题：高等教育如何为实现目标——包括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传统目标——而融资？

排名	综合大学	学生人均 宽带容量 (kb/秒)	2000年 总体排名
1	中山大学(台湾)	33.53	20
2	庆北大学(韩国)	29.76	35
3	忠南大学(韩国)	20.84	50
4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19.58	8
5	台湾师范大学	19.02	37
6	首尔(汉城)国立大学(韩国)	17.14	4
7	清华大学(台湾)	14.77	18
8	京都大学(日本)	14.17	1
9	全南大学(韩国)	13.52	34
10	东北大学(日本)	11.84	2
11	天津大学(中国)	11.54	46
12	西安交通大学(中国)	10.81	54
13	新加坡国立大学	7.1	5
14	卧龙岗大学(澳大利亚)	6.92	45
15	阿德莱德大学(澳大利亚)	6.88	26
16	名古屋大学(日本)	6.58	11
17	中央大学(台湾)	6.12	24
18	墨尔本大学(澳大利亚)	6.06	9
19	农业大学(泰国)	5.56	63
20	交通大学(台湾)	5.5	28

来源: <http://www.asiaweek.com>

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都面临这一难题。比如，就美国公立大学而言，现在只有 15% 到 20% 的经费来自州议会拨款，其余资金要靠学校自身筹措。这样一来，优质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在行政目标与策略上变得非常相像。就我所知，各大学有以下四种筹资选择：

- 让传统资源带来更多收入(如提高学费，征收租用费，加强行政管理)；
- 发展更多的收入来源(如获得发明专利或进行投资)；
- 更有效益地分配现有资源(如从单项资金转向集合资金，或对教职工工资作进一步区分)；
- 取消一些过时的专业或服务(如家政学)。

所有这些选择都具有争议。优质大学不但要成功筹措资金，而且还要明智地分配资源，从而保持其公益功能。当然，各个学校为各自目标融资的成效不一。有些学校行动迟缓，因为它们可能还没有认识到，任何大学要达到高质量，就都必须自行融资和管理。

有些人可能把这个趋势看作是高等教育的"商业化"。还有人把它看作是高等教育的"美国模式"全球化。不过，对于这种最大利用资源的必要性我持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不是商业化，而是高等教育把对高质量的合理追求变得专业化。这也不是美国的模式，而是一种成功的模式，即所有高等学府都必须参与解决今天普遍存在的公共资源短缺的困境。

社会聚合力

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影响是，高等教育对社会协调发展的作用。公立与私立大学都有责任帮助维系公民和平相处及邻里和睦，以及确保毕业生在劳动市场上能够有不负众望的表现。

无论大学的主要目的是教学、研究，还是职业培训，它们都会在两方面对社会的和谐产生影响。一是贯穿在历史、文化、生物学、物理学、工程学、环境学教学中的课程大纲与专业态度。高质量的大学会对世界文献和史料持开明立场，无拘无束地向所有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课题和内容。任何优秀大学都不会对信息来源实行限制。



2005 年 10 月，路易斯安那州大学学生抵达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受到总领事博德 (Peter W. Bodde)(左)以及黑森州科学与艺术部长科茨(Udo Corts)(右)的欢迎；这些因卡特里娜飓风而中断学习的学生，应邀到这里继续学业。(BERND KAMMERER AP/WWP)

第二个方面在于大学如何树立行为典范和体现专业准则。这包括：校方对优异学术成就给予奖励的诚实公平程度；教职员工与行政部门在多大程度上公开提倡并遵循行为准则；以及学校在多大程度上珍视公开的讨论和不同意见。学校展现的上述特征越多，学生在知识技艺中就越可能体现出人的价值资本，学生也会对社会资本作出更大贡献，即愿意为公共利益奉献，并比较宽容和理解其他观点意见。

那些展现高水平的人的价值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大学，是高质量的大学。恰恰是这些高质量的大学，能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凝聚力产生最积极的影响。这也就是说，当大学出现腐败，当分数、录取、鉴定等可以因贿赂而改变时，这个国家的社会凝聚力就受到威胁。腐败的大学不但不能树立良好的行为模式，而且还会树立反面的、有碍国家前途的行为模式。

今天，高校反腐败是一个全球问题，事关重大。欧盟成员国正通过博洛尼亚进程(The Bologna process)协调其高等教育体系，使欧盟各国学生与教师具有更大的流动性；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新鉴定标准指南，则使世界各地大学能够在学术质量方面相互比较。愿意参与比较的学校往往能够显示自身具有透明度。

证明学校质量的责任，在于接受鉴定的大学本身。学校如果不能证明自己的信誉，那么在劳动市场上，其学生将永远处于劣势，而且，可能要引起公众追究公共投资究竟带来了多少效益。

总之，在高等教育中，有一种越来越成功的"模式"，适用于世界各地。这个模式就是：高等学府能够通过自己融资来实现目标。有一点越来越清楚：高等教育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凝聚力有着独特的作用——如果不按职业规范行事则产生消极作用，如果按国际标准行事则发挥积极作用。



这些卡塔尔学生正在设在多哈市的弗吉尼亚州立大学(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艺术学院上课，学习印刷排版。(AP/WWP)



文献目录

有关全球化讨论的阅读资料(英文)

Friedman, Thomas L.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5.

Gugler, Josef, ed. *World Cities Beyond the West: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Measuring Globalization: The Global Top 20," *Foreign Policy*, no. 148 (May/June 2005): pp. 52-60. [Fifth Annual A.T. Kearney/Foreign Policy Globalization Index]

Na□, Mois□. "Globalization: Passing Fad or Permanent Revolution?"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v. 26, no. 1 (Spring 2004): pp. 84-85.

Perrons, Diane.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People and Places in a Divided World*.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Veltmeyer, Henry, ed. *Globalization and Antiglobalization: Dynamics of Chang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Aldershot, Hants, UK;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5.

文化

Appiah, Kwame Anthony. *Cosmopolitanism: 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 New York: W.W. Norton, 2006.

Cowen, Tyler. *Good and Plenty: The Creative Successes of American Arts Fund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Cowen, Tyler. "The Fate of Culture," *Wilson Quarterly* (Autumn 2002): pp. 78-84.
<http://www.gmu.edu/jbc/Tyler/fate-of-culture.pdf>

Hackett, Robert A., and Yuezhi Zhao, eds. *Democratizing Global Media: One World, Many Struggle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5.

O'Sullivan, John. "The Role of the Media at a Time of Global Cri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World Peace*, v. 21, no. 4 (December 2004): pp. 69-79.

Pells, Richard. "American Culture Goes Global: Or Does It?"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v. 48, no. 31 (April 12, 2002): p. B7.

Pells, Richard. *From Modernism to the Movies: The Globaliz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Rantanen, Terhi. *The Media and Globaliz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5.

Robertson, Robbie. *The Three Waves of Globalization: A History of a Developing Global Consciousness*. Nova Scotia, [Canada]; Fernwood; New York: Zed Books, 2003.

Veseth, Michael. *Globaloney: Unraveling the Myths of Globalization*.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5.

经济

Barfield, Claude E., G 槩 ter Heiduk, and Paul J.J. Welfens, eds. *Internet, Economic Growth, and Globalization: Perspectives on the New Economy in Europe, Japan, and the USA*. New York: Springer, 2003.

Barker, Drucilla K., and Susan F. Feiner. *Liberating Economics: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Families, Work, and Globalization*. Ann Arbor, MI: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Bhagwati, Jagdish N. *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Buch, Claudia M. *Globaliz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Causes of Incomplete Integration and Consequences for Economic Policy*. Berlin; New York: Springer, 2004.

Cavanagh, John, and Jerry Mander, eds. *Alternatives 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 Better World Is Possible*. 2nd ed. San Francisco, CA: Berrett-Koehler, 2004.

Chandler, Alfred D., and Bruce Mazlish, eds. *Leviathan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New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2005.

Das, Dilip K. *The Economic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Drainville, Andr C. *Contesting Globalization: Space and Place in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Hanson, James, et al., eds.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U.S. Fiscal Policies and Priorities for Long-Run Sustainability*. Washington, DC: IMF, 2004.

Isaak, Robert A. *The Globalization Gap: How the Rich Get Richer and the Poor Get Left Further Behin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Financial Times, 2005.

Laudicina, Paul A. *World Out of Balance: Navigating Global Risks to Seize Competitive Advantage*. New York: McGraw-Hill, 2004.

Legrain, Philippe. *Open World: The Truth About Globalization*. Chicago: Ivan R. Dee, 2004.

Lele, Uma J., and Chris Gerrard.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An Independent Evaluation of the World Bank's Approach to Global Program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4.

Mander, Jerry, and Victoria Tauli-Corpuz, eds. *Paradigm Wars: Indigenous Peoples' Resistance 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 Speci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Globalization, Committee on Indigenous Peoples*. San Francisco, CA: International Forum on Globalization, 2005.

Michie, Jonathan, ed. *The Handbook of Globalisation*. Cheltenham, UK: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2003.

Naï, Moïse. *Illicit: How Smugglers, Traffickers, and Copycats Are Hijacking the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Doubleday, 2005.

Ocampo, José Antonio, and Juan Martín, eds.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A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Perspective*. Palo Alto, CA: Stanford Social Scienc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3.

Pink, Daniel. *Free Agent Nation: The Future of Working for Yourself*. New York: Warner Business Books, 2002.

Rivoli, Piera. *The Travels of a T-Shirt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 Economist Examines the Markets, Power, and Politics of World Trade*.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5.

Runge, C. Ford, et al. *Ending Hunger in Our Lifetime: Food Security and Globalizat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2003.

Rupert, Mark, and M. Scott Solomon.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Politics of Alternative Future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6.

Smith, Neil. *The Endgam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Stark, Jürgen. "The State of Global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v. 19, no. 2 (Spring 2005): pp. 52-55.

Stiglitz, Joseph.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Norton, 2002.

Weinstein, Michael M., ed. *Globalization: What's New?*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Wolf, Martin. *Why Globalization Work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教育

Heyneman, S.P. "Defining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 on Social Cohe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olicy, Research and Practice* (Winter 2002/3): pp. 73-97.

Heyneman, S.P. "Education and Corrup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v. 24 (2004): pp. 637-648.

Moiseyenko, Olena. "Education and Social Cohesion: Higher Education," *Peabody Journal of Education*, v. 80, no. 4 (2005): pp. 89-103.

"A New World View: Education in a Global Era," *Phi Delta Kappan*, v. 87, no. 3 (November 2005): pp. 184-245.

Rumyantseva, Nataliya L. "The Taxonomy of Corrup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Peabody Journal of Education*, v. 80, no. 1 (2005): pp. 81-92.

人权

Brysk, Alison, and Gershon Shafir, eds. *People Out of Place: Globalization, Human Rights, and the Citizenship Gap*.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Moghadam, Valentine M. *Globalizing Wome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安全

Barkawi, Tarak. *Globalization and War*.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6.

Carmody, Pdraig. "Transforming Globalization and Security: Africa and America Post-9/11," *Africa Today*, v. 52, no. 1 (Fall 2005): pp. 97-120.

Copley, Gregory R. "Preparing for the Post-Terrorism Era," *Defense and Foreign Affairs Strategic Policy*, v. 33, no. 9 (September 2005): pp. 2-4.

Echevarria, Antulio J. and Bert B. Tussing. *From "Defending Forward" to a "Global Defense-in-Depth": Globalization and Homeland Security*.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3.

Florida, Richard. "The World Is Spiky," *The Atlantic Monthly*, v. 296, no. 3 (October 2005): pp. 48-51.

Haas, Richard N. "The Politics of Power: New Forces and New Challenges,"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v. 27, no. 2 (Summer 2005): pp. 60-65.

Miskel, James F. "Grand Strategies for Dealing With Other States in the *New, New World Order*,"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 58, no. 1 (Winter 2005): pp. 63-75.
<http://www.nwc.navy.mil/press/Review/2005/Winter/art3-w05.htm>

Morgan, Matthew J. "The Origins of the New Terrorism," *Parameters*, v. 34, no. 1 (Spring 2004): pp. 29-43.
<http://carlisle-www.army.mil/usawc/Parameters/04spring/morgan.htm>

Nassar, Jamal R. *Globalization and Terrorism: The Migration of Dreams and Nightmare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5.
<http://www.rowmanlittlefield.com/Catalog/SingleBook.shtml?command=Search&db=^D/B/CATALOG.db&eqSKUdata=0742525031>

Nye, Joseph.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Rapley, John. *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y: Neoliberalism's Downward Spiral*.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04.

Rosenau, James N. *Distant Proximities: Dynamics Beyond Globaliz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Sicherman, Harvey. "Cheap Hawks, Cheap Doves, and the Pursuit of Strategy," *Orbis*, v. 49, no. 4 (Fall 2005): pp. 613-629.
<http://www.fpri.org/orbis/4904/sicherman.cheaphawksdoves.pdf>

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Mapping the Global Future: Report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s 2020 Project, Based on Consultations With Nongovernmental Experts Around the World*.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2004.
<http://www.foia.cia.gov/2020/2020.pdf>

Van Rooy, Alison. *The Global Legitimacy Game: Civil Society, Globalization, and Protest*.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